

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毛主席语录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目 录

- 孔家店的幽灵与现实的阶级斗争……………史反修 (1)
- “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和刘少奇鼓吹
- “孔孟之道”的反革命目的……………师宣革 (12)
- 刘少奇为什么要为孔子招魂? ……史 锋 史红青 (23)
- 叛徒、汉奸、特务王明为什么要替孔子翻案?
- ……………横沙岛“八·二六”大学写作组 (28)
- 孔子的阴魂不散说明了什么? ……史坚斌 (32)
- 从“敲门砖”到“垫脚石”……………沙延望 (42)
- “朝圣”就是为了篡权复辟
- …………… 济南部队装甲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胡秀昌 (45)
- 从“同孔子妥协”看刘少奇的叛徒嘴脸
- …………… 济南部队装甲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曹满栋 钱正康 (49)
- 砸烂孔子和刘少奇的“修养”经…………… 驻沪空军 卫红鹰 (52)
- 孔孟的“四书”和刘少奇的黑《修养》……………史反修 (55)
- 尊孔·修养·复辟
- 从黑《修养》的三次出笼看刘少奇篡党篡政的反革命阴谋
- …………………………华史斌 (59)
- 孔子的“仁”和刘少奇的“老人心肠”是一路货
- …………… 上海国棉三十厂 冯慧芬 (64)

- 拆穿“仁”的假面具… 川沙县赛路公社 华炳新 葛文新 (67)
- 在“仁爱”背后的血淋淋杀机…………… (70)
- 伪善者的哲学…………… (72)
- 是“爱人” 还是“吃人”
- 孔子的“仁”的虚伪性和反动性……………红 戈 (74)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实质
- …………… 复旦大学红卫兵 伍 坚 肖 矢 (78)
- 批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谬论
- ……………驻上海师范学院工宣队十二连 (82)
- 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谬论…………… 巩旭黎 (85)
- “中庸之道”是反革命之道……………上袜四厂 陶友之 (89)
- 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人民电机厂工人写作组 (93)
- 驳“善为战，大罪也”…………… 上海警备区某部 张贤伯 (96)
- 决不听信一切帝国主义的“好话”
- 戳穿孔子“君子戒斗”的谎言……………驻沪空军 卫红鹰 (99)
-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最勇敢
- 批臭孟子“死伤勇”的谬论……………驻沪空军 冲霄汉 (102)
- 孔孟的“忠、孝、节、义”是啥货色？
- …………… 松江县泗联公社九星大队贫农 王宝宝 (105)
- 大批刘少奇宣扬的“孔孟之道” 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
- 松江部分干部、贫下中农批判孔子座谈会纪要…………… (108)
- 揭穿“礼尚往来”的反动实质…………… 青浦县 青红哨 (120)
- 彻底埋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鬼话
- ……………上海县 辛农文 (123)
- 坚持晚婚 继续革命
- 斥孔孟的反动婚姻观…………… 松江县 红 松 (125)

妇女力量半月天

——批孔子轻视妇女的反动思想……………上海县 余 红 (128)

驳“父母在,不远游”……………华锋汉 (131)

从“学而优则仕”到“读书做官论”

……………南市区工宣队 南胜虎 (134)

彻底粉碎刘少奇宣扬孔子反动教育思想的罪恶阴谋

……………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138)

砸烂孔子教育观上的三块黑牌……………洪教施 (149)

从“四氏学”看孔子“有教无类”的反动本质……………永卫东 (157)

学习鲁迅批判孔家店的彻底革命精神

……………上海师范学院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写 (160)

孔家店的幽灵与现实的阶级斗争

史 反 修

孔家店，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的破烂的思想武库，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来进行复辟活动的黑店。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给了孔家店以沉重的打击，可是数十年来，孔家店的幽灵却一直未灭。一切剥削阶级先是千方百计保护它，使它免于死亡，继则高唱挽歌为它招魂，使它复辟。研究一下围绕孔家店问题所展开的一场又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翻案和反翻案的阶级斗争，对于我们深刻地认识现实的阶级斗争，认识思想文化领域中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是很有教益的。

孔家店被打翻后阴魂不散

一九一九年，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我国发生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这在中国历史上，划出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革命舆论是革命斗争的先导。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五

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打破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对孔家店的迷信，在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起了舆论准备的作用。

在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变成了群众的革命口号，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新飞跃。五四运动对那些封建军阀、反动文人等一切复古主义者的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的反动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打击，激烈地抨击了孔家店反动的伦理道德、专制制度的政治和黑暗社会的家族制度，极大地振奋了无数长期在封建思想压制下的革命人民和革命青年。鲁迅，“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以新文学武器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残酷的家族制度和吃人的旧礼教。他对罪恶累累的孔家店的控诉和批判，是一把插入吃人的封建制度心脏的匕首。在中国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后，“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

孔家店被打翻了，可是它的阴魂不散。种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都跳了出来，借孔家店的破庙作为反革命的舆论阵地，进行疯狂的反扑。一股为孔家店招魂的复辟逆流绵延达五十年之久。

以康有为、林琴南、辜鸿铭等为代表的保皇党和封建余孽是孔家店的几个卫道小丑。他们在孔家店即将坍塌之际跳了出来，提倡“尊王”、“尊孔”，主张恢复祀天祭孔，以孔子配天，

恶毒地攻击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甚至鼓吹“强有力者”即反动统治势力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对新文化运动进行血腥镇压。在孔家店被打垮之后，康有为这个封建余孽还特地到曲阜向孔子磕头作揖，竭力为孔家店招魂。

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面对着革命群众对孔家店的猛烈冲击，开始尚不敢公然反对。但是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他们敌视工农、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的反动面目越来越暴露，很快就背叛了原来赞成过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重新打起了孔家店的破旗。他们不仅发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谬论，极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且积极提倡“整理国故”的反动口号，号召青年钻到孔家店这座破庙中去向孔子这个幽灵顶礼膜拜。

一切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更是积极地把复辟孔家店作为巩固他们反动统治的舆论工具。人民公敌蒋介石为巩固蒋家王朝的法西斯统治，积极推行了反革命的卑鄙无耻的“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实施尊孔读经的复古教育，定孔子生日为“国定”纪念日，通过“尊孔祀圣”决议，并杜撰了一套“诚的哲学”来愚弄全国人民，还效法历代封建统治者，跑到曲阜去“朝圣”。蒋匪还特别创办“复性书院”，雇佣一批反动文人，以宣扬孔学为宗旨。他们大肆叫嚷什么“欲完成建国大业，端在儒家思想之复活”，“孔子为中国文化之柱石，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者也”，等等，把孔孟之道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也并不例外。他在一九二五年背叛革命从狗洞里爬出来后，就捧着反动军阀赏赐的“四书”，开始了他贩卖孔孟之道、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的无耻生涯。

他滔滔不绝地宣扬孔孟之道的黑货，并且步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后尘，在解放以后又演了曲阜“朝圣”的丑剧，无耻宣扬“孔夫子是圣人”，祭起为孔家店复辟的招魂幡。

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 今天的卑鄙行为辩护

半个世纪以来，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为孔子招魂、为孔家店复辟的反革命活动，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要大肆吹捧孔孟之道，为孔家店招魂？为什么孔子死了二千年了，这具僵尸对这些反动派来说还这么有用，能够吸引住那么一批苍蝇围着它嗡嗡叫？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被封建地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孔子和孔家店，到底是什么货色？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到前四七九年)，名丘，字仲尼，是我国春秋末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出生于破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孔子的思想代表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由他的学生纪录整理的《论语》一书，就是没落奴隶主的思想体系的代表作。孔子对殷周奴隶制国家的典章制度无条件地拥护，对制礼作乐的周公极为向往，梦想要恢复殷周全盛时期的奴隶制统治。他所谓“信而好古”，“信”的是奴隶制，“好”的也是奴隶制。他一生的实践就是维护奴隶制国家统治的反动实践，对一切社会变革他都反对，甚至利用职权杀了要求改革的人。他提倡的“正名”，就是“正”奴隶制统治之“名”，要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自己的名分，目的就是维护殷周以来奴隶制

国家的统治秩序。作为孔子的哲学思想核心的“仁”，他有一个解释：“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礼”，就是区分奴隶制的等级标准。“复礼”，就是要恢复殷周奴隶制，使人人安守本分，天下才能“归仁”。因此，从孔子的哲学思想到政治思想，就是维护奴隶制统治的反动思想，表现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对奴隶制灭亡的不甘心 and 垂死挣扎。孔子死后，由他的孙子子思以及子思的学生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这种反动思想，而成为所谓“孔孟之道”。这种反动之道是代表没落的、反动的、腐朽的阶级的思想，是他们的哀鸣和挽歌。

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孔子的没落奴隶主的思想体系逐步演变成了为封建剥削制度辩护的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从汉朝的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到宋代的朱熹的封建理学，就是封建统治思想发展的道统。“孔孟之道”于是又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维护私有制的剥削之道，成为他们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束缚革命人民的无形枷锁。

为孔家店招魂的蒋介石和刘少奇等人都是没落的、反动的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的阶级本性，和孔子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的阶级本性是一致的。他们利用“孔孟之道”作为维护反动统治和复辟失去的“天堂”的破烂武器，就如同马克思所说，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是“怯懦地运用魔法，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这种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孔子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复古思想，适应了一切反动阶级的需要。孔子“信而好古”，孟子言必称文武，他们梦寐以求的是恢复奴隶制极盛时代的统治和等级制度，极

力主张维护旧秩序,反对一切社会改革。袁世凯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梦想恢复到封建帝制的皇权时代,他重演“朝圣”的丑剧,为的是从孔孟那里寻求复古——当皇帝的根据。蒋介石为了建立他的法西斯独裁的反动统治,也要求助于孔子的反动复古思想。这就是借封建的“大一统”,来为他现实的反革命的“大一统”的“建国大业”服务。他以封建主义“大一统”和“王者受命于天”的理论,作为他现实的法西斯独裁的反动理论根据。同时,复“孔孟之道”之“古”,又可以利用“孔孟之道”来对抗、削弱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影响,建立他的法西斯思想统治。刘少奇,这个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老反革命,从孔子反动复古的垃圾堆里拣出破烂,揉和到他的黑《修养》里去,说什么要“学习我国历代圣贤的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就是用心险恶地要我们的党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妄图维护和复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一切反动阶级对于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总是竭力加以抹杀和掩盖。孔子和他的后继者,极力宣扬所谓“忠恕”、“以德报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之道”,就是要被压迫阶级忍受剥削阶级的压迫、奴役,不要斗争,不要反抗,这种奴隶主义哲学赤裸裸地宣扬了阶级统治、阶级剥削的“合理性”。蒋介石为了维护他的建立在火山口上的反动统治,为了扑灭革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使他的走卒,大肆宣扬要使“儒家思想复活”,说什么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天下惟一无二的真理”,妄想用“孔孟之道”麻痹革命人民的革命意志。刘少奇在一九三九年所抛出的黑《修养》,差不多集中了孔孟之道的全部“精华”。它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一九六二年,他再次抛出黑

《修养》，根本不谈无产阶级专政，不谈资产阶级妄图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不谈反对帝、修、反的斗争。他在黑《修养》中，大肆贩卖什么“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德报怨”，什么“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等等，等等，无一不是“孔孟之道”的谬论。刘少奇鼓吹这一套，就是要欺骗人民，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妥协，搞阶级调和、阶级投降，推行他的亡党亡国的机会主义路线，就是要革命人民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任凭他们搞和平演变，任凭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孔子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建立在他的这一反动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修养”经，也为一切剥削阶级奉为至宝。孔子编造了一套唯心主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的“修养”经来毒害、麻醉人民。他的后继者曾参、子思等提出的什么“慎独”、“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等等，都是彻头彻尾唯心主义的“修身养性”的论调，为的是把人们培养成反动统治阶级忠实的奴才，追求个人名利的蠢虫。到了宋朝理学家的手里，更是竭力鼓吹三纲五常，强调“其要只在慎独”，要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俯首帖耳地接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继承了袁世凯衣钵的北洋军阀政府曾强迫学生读“经”，是为了把青少年“修”成对他们有利无害的少年“古董”；蒋介石之所以喊破喉咙为反革命的“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大做广告，并且杜撰出一套“诚的哲学”强迫推行，就是企图用这套唯心主义来毒害人民，愚弄人民，以达到维护和加强其反动统治的目的。刘少奇这个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老反革命，大肆宣扬孔孟的“修身养性”，什么“吾日三省吾身”、“慎独”、“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等等，一

句话,就是要人们离开现实的阶级斗争,去搞唯心主义的“修身养性”,“修”成伪君子,“修”成“驯服工具”,“修”成向帝、修、反屈膝投降的奴才。

“孔孟之道”又是欺骗和伪善的假面具,历史上的一切反动统治者都少不了借用这副面具。他们把剥削阶级的思想乔装打扮,专事欺骗人民;他们高唱的是一套,自己干的又是一套。孔子是谈“仁”的,他自己对“仁”的解释是“爱人”。但是,他爱的是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他是讲“仁”的,而对被统治阶级,他就要进行镇压,就不讲“仁”,也不“爱人”了。这就是孔子伪善和残忍的两面。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封建道学家们,实际上是一肚子的男盗女娼。汉奸刽子手曾国藩学得道学的虚伪,专标一个“诚”字,有人就专标一个“伪”字来拆穿他。蒋介石,这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大大地发展了他的“先师”曾国藩的反革命两手政策,一边残忍地把屠刀向革命人民砍去,一边又阴险地刮起尊孔读经的妖风,鼓吹“仁、义、礼、智、信”。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他明明是一个老反革命,是双手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叛徒,偏偏要装成一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明明是一个大工贼,偏偏要把自己打扮成“工运领袖”。刘少奇这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继承了历史上反革命两面派的衣钵。这就是刘少奇吹捧“孔孟之道”的又一个原因。

对现实阶级斗争的几点有益启示

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以及叛徒、内奸、工贼

刘少奇等人，他们为孔家店招魂的反革命阴谋，虽然都已被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碾得粉碎。但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半个世纪以来，从这股绵延不断地为孔家店招魂的反革命逆流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它告诉我们，一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们进行复辟的一个方式，就是为历史上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翻案，为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体系进行翻案。一切反动没落阶级可以抬出孔子这个亡灵为他们反革命目的的现实服务，可以设想，他们一定还会有新的花招，也可能抬出别的什么僵尸为他们效劳，在新的伪装掩盖下，贩卖旧的思想武库中的破烂。形式可以不同，目的却是一个。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可以抬出耶稣基督的偶像，来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反革命两手政策进行欺骗宣传；苏修叛徒集团也可以利用老沙皇的亡灵，来为他们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为孔家店翻案的人一直在活动着。直到最近，那个早已为中国人民唾弃了的苏修豢养的走狗、叛党叛国的汉奸、特务王明，还为孔子招魂，如丧考妣地痛悼着孔家店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所摧毁。现实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代表帝、修、反的阶级利益、作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总代表的刘少奇，在他失败之后，是不是会有人如同为孔子招魂一样，替他和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呢？现实的斗争已经证实了这

点。就在刘少奇被革命人民揪出后不久，当革命触动了资产阶级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时，就产生了一九六六年冬季到一九六七年春季那股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被亿万革命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的逆流。“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还要继续下去，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丧失警惕！

其次，它还告诉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一切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正如《十六条》所指出，“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列宁说过：“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反动统治阶级所以能够利用尊孔复古，是因为“孔孟之道”的反动影响还在毒害着人们，也就是说还存在着它的社会思想基础。这一种反动传统观念，并不因为我们打倒了封建地主阶级就不存在了。只要回顾下一九六二年封建地主阶级的残余还利用封建宗族关系来续封建家谱，就可以认识到这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至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影响，则比“孔孟之道”的影响大得多，深得多。要同传统的旧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的“公”字战胜资产阶级的“私”字。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斗私，批修”的过程。如果放松对旧思想的批判，那末陈旧的东西完全可能在新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死人还会再缠住活人的

头脑，已经被批判被打倒的东西还可以死灰复燃，招摇过市，毒害人们，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基础。我们一定要看到：封、资、修的垃圾仍然在一些人们头脑中存在，“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无产阶级要用自己的思想体系去战胜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用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就讲过：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我们必须高举革命大批判旗帜，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所向无敌的武器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肃清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个领域包括文化领域中的流毒。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不停地主动地打进攻仗，彻底摧毁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堡垒，把上层建筑领域的大革命进行到底！

（据一九六九年第六、七期《红旗》转载，原载六月十三日《解放日报》）

“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和刘少奇 鼓吹“孔孟之道”的反革命目的

师 宣 革

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孟之道”，几千年来，一直被剥削阶级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道”；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压迫、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锁链，是我国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思想中最顽固的堡垒。虽然在我国剥削制度早已被推翻了，但是，孔子的阴魂却一直不散，“孔孟之道”的幽灵还在一些阴暗角落里游荡，腐蚀人们的灵魂。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出于他的反革命需要，几十年来，狂热地鼓吹“孔孟之道”，为孔子招魂，起了极其反动的作用。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揭露“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揭露大叛徒刘少奇鼓吹“孔孟之道”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摧毁“孔孟之道”这一剥削阶级思想的最顽固的堡垒，是思想战线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一、孔子思想的反动本质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我国春秋末期（公元前五五一年——公元前四七九年）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出身在

中国奴隶社会末期一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开始是替贵族办丧事，大约是吹鼓手。以后在鲁国做管理粮草和牛羊畜牧的小官，后来当了掌理刑法的大官。他是我国古代奴隶制度的狂热的拥护者，奴隶主阶级的忠实代言人。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度土崩瓦解，奴隶奋起反抗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夺权的时代。孔子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对奴隶制度的衰亡和奴隶主贵族的没落，感到十分痛心；而对奴隶制度兴盛时期的商朝、周朝却无限向往。他领着他的学生坐着马车，周游列国，到处宣传他的思想，表现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对奴隶制灭亡的不甘心和垂死挣扎。他的政治立场是极端反动的。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孔子办学讲经，提出了一整套的反动思想。他的思想集中在由他的学生整理的《论语》里面。孔子死后，孔子的孙子子思以及子思的学生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反动思想，而成为“孔孟之道”。

孔子思想的内容很庞杂，其中主要的是关于“礼”和“仁”的学说。

所谓“礼”，就是奴隶社会的等级标准。中国的奴隶社会，不仅奴隶主与奴隶之间有绝对的阶级界限，就是奴隶主中的大贵族和小贵族之间也有严格的等级划分，每一等级都规定有相应的制度。到了春秋末期，由于奴隶的起义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兴起，“礼”也就名存实亡，变成徒具形式的东西了。这是经济基础的变化在上层建筑中的反映。孔子对此十分恼火。他看到大夫用天子的八个行列的舞乐，到名山大川去祭神，诸侯袭用天子的礼仪祭祀祖先，都竭力反对。在孔子看来，等级名位的错乱逾越，是社会一切变乱的根源。他鼓吹

“礼”，就是竭力想要恢复已经衰败的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一切继续按老规矩办事，要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合乎“礼”的规范和要求，不要有任何犯上作乱的行为，借以使奴隶安于被剥削的命运，以及抵抗新兴的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夺权，这样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避免奴隶制度的崩溃。

孔子鼓吹的“仁”，他自己作过不少解释，说得比较多的，就是所谓要“爱人”。这里，我们不要被表面的词句所欺骗了，孔子的所谓“爱人”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他说得很清楚：“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还说：“克己复礼为仁”。前一句是说，奴隶主贵族老爷们虽然也有不仁的，但大都是仁爱的，而一般奴隶和平民则绝没有一个是仁爱的。既然“小人”都是不仁的，当然也就被排斥在“爱人”的范围之外了。后一句是说，约束自己，把自己的言行纳入“礼”的规范就是“仁”。这就十分明显，孔子所谓的“仁”，是“复礼”的手段，是号召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团结的一个政治口号，是要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相亲相爱，而决不是要爱一切人。他鼓吹“仁”，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统治和奴役，为了挽救衰朽没落的奴隶制度的死亡。

二、“孔孟之道”是一切剥削阶级 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

孔子死后，历代封建帝王，一直到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王朝，都把孔子捧为“圣人”，孔子的思想也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经典”，成为一切剥削阶级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

孔子生前是并不得志的，不仅劳动人民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各国的统治者也都不肯重用他。他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成为封建社会思想的“正宗”，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在他死后三百多年，从汉武帝开始的。汉武帝想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他意识到百家并立，思想不统一，对建立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巩固自己的统治是很不利的。他接受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其他学说都宣布为“异端”加以禁止，规定孔子的“儒术”才是唯一的“正统”。从此，“孔孟之道”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随着孔子地位的提高，从汉以后，历代的封建帝王，也都学会“尊孔”，自称是孔子思想的信徒。唐太宗以后，更为孔子大修庙宇，不断赏给孔子后裔大量土地并免除赋役。这样，“孔家店”不仅成了封建统治阶级从精神上奴役人民的大黑店，也成了世代相传的大恶霸、大地主。

毛主席教导我们：“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孔子思想为什么会被历代封建帝王看中，在封建社会中一直成为统治的思想？就是因为它是积极为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的剥削制度辩护的。孔子把人划分为“君子”和“小人”，“君子”是劳心者，是“治人”的，而“小人”是劳力者，是供养“君子”，只配受“君子”统治的。这就从理论上把封建的剥削制度和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固定下来，并使它合法化了。孔子又宣扬“天命”，说什么阶级压迫、等级悬殊等等不平等现象，都是出于天意，人是不能有异议的，要被剥削者安于被剥削的命运，接受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而不要犯上作乱。对剥

削阶级，孔子则教给他们一套统治的方法，要他们除了武力镇压之外，还要讲“德治”、“教化”，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要进行思想欺骗，加强思想统治；在进行剥削的时候，要顾到将来，要有节制，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所有这些，都是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而又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孔孟之道”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享有如此特殊的地位，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经过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封建王朝被推翻以后，孔子并没有从“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宝座上跌下来。清朝的遗老遗少，军阀，资产阶级政客，都死死抓住孔子的幽灵不放。伟大的“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对“孔家店”的迷信，但是，孔子的阴魂并没有散，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一切革命的敌人，都竭力为“孔家店”翻案。那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也效法历代帝王，跑到曲阜去“朝圣”，大捧孔子为“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政治上是不坚强的，“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因此，不能不从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破烂的思想武库中去寻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而“孔孟之道”维护剥削制度的反动本质和复古倾向，又正好符合了他们政治上的需要。

“孔孟之道”也博得了帝国主义的喝彩，那些一向蔑视中国文化的帝国主义分子，也都不约而同地吹捧孔子。美国人李佳白就鼓吹“孔教原理为人类共同之原理”，要“中国人永远信奉中国之孔教”。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期间，一面烧杀抢掠，一面却为孔子大唱赞歌，说“孔孟之道”是“中国古有文

化之结晶”，孔子是“先师德隆千圣，道冠百王”。这是因为在帝国主义者看来，“孔孟之道”可以腐蚀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意志，是他们实行精神奴役的有力的工具。

中国的剥削阶级和外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对吹捧孔子，宣扬“孔孟之道”如此“志同道合”，他们的目的，都是要用写满了“忠孝仁义”的孔子的教条进行欺骗，从思想上麻痹劳动人民，阻止劳动人民起来反抗斗争，使剥削制度万古长存。但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任何人不能抵抗的。孔子的幽灵既不能阻止奴隶制度的崩溃，也不能阻止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不但要把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而且要把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连同“孔孟之道”彻底埋葬，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三、大叛徒刘少奇鼓吹“孔孟之道” 的反革命政治目的

“孔孟之道”是压迫之道，剥削之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是水火不相容的。可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出于他的反革命需要，唯恐“孔孟之道”这个宝贝在中国绝了种，竟然步历代封建帝王和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后尘，拚命为孔子招魂，狂热地鼓吹“孔孟之道”。

大叛徒刘少奇对孔子的吹捧，比之历代封建帝王可谓是有过之无不及。早在一九四二年，他就这样鼓吹：“孔子的思想在当时是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到今天还有其合理的因素”，“对我们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有用”，“应该利用

它”。一九五一年，刘少奇窃踞国家副主席职位以后不久，他又效仿历代封建帝王，演了一出“朝圣”的丑剧。他不远千里从北京跑到曲阜去向孔子顶礼膜拜，站在孔子的泥像前，一口一个“孔老夫子伟大”，“孔老夫子是圣人”，对孔子赞不绝口。见了清朝皇帝康熙、乾隆“朝圣”后立的“驻蹕亭”，不禁脱口而出：“我们也搞一个”。一九四二年离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已经二十多年，离马克思主义诞生将近一百年，刘少奇还狂热地鼓吹“孔孟之道”“合理”，对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有用”，并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还跑到曲阜去向孔子“朝圣”，刘少奇究竟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究竟是那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任何人对古人的褒贬爱憎，都反映了他的世界观，反映了他对现实的政治态度。一切反动没落阶级抬出孔子这个亡灵，都是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的。刘少奇这个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吹捧孔子，鼓吹“孔孟之道”的反革命政治目的，就是妄图要我们党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妄图维护和复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这个方面，“孔孟之道”正完全适合他的反革命政治需要。

刘少奇鼓吹“孔孟之道”，就是要利用“孔孟之道”，宣扬阶级调和，掩护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刘少奇在黑《修养》中大肆贩卖的什么“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德报怨”、“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等等，全是“孔孟之道”的黑货，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无产阶级对一切剥削阶级决不能讲“忠恕”，行“仁政”。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剥削阶级，我们的原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

人，不是“以德报怨”、“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而是革命造反，把他们打倒，对他们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刘少奇贩卖“孔孟之道”那一套，就是妄图麻痹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只准他猖狂向党进攻，不准革命人民进行反击，以实行他篡党篡政的罪恶阴谋。

刘少奇鼓吹“孔孟之道”，就是要利用“孔孟之道”，宣扬愚民政策，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成为他的“驯服工具”。列宁曾经指出：“资产阶级所以能够支持，不仅依靠暴力，而且依靠群众的不觉悟、守旧、闭塞和无组织。”一切剥削阶级，由于它和人民利益的根本对立，都害怕人民群众的觉悟。因为人民群众一旦觉悟，就会起来斗争，推翻他们的统治。作为奴隶主代言人的孔子，很懂得这一点。他极力鼓吹愚民政策，胡说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说剥削者可以驱遣被剥削者，但绝不能启发被剥削者的智慧，不能让他们懂得道理。对这一点，刘少奇心领神会，他完全承袭孔子的这一套，大肆鼓吹“驯服工具论”，叫嚷什么：“不论对与不对都要服从”，“要作驯服的工具，要作容易驾驭的工具”，他的恶毒用心，就是妄图用这样一副精神镣铐，扼杀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的革命性，要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作他顺从的奴隶，为他实现篡党、篡政的阴谋服务。

刘少奇鼓吹“孔孟之道”，就是要利用“孔孟之道”，宣扬剥削阶级的腐朽的人生哲学，来腐蚀广大党员、干部的灵魂。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他的弟子进一步说：“学而优则仕”。孟子又加以发挥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读书是为求得功名利禄，为了做官，“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是为个人在将来担负“大任”，即当大官。这

是彻头彻尾的剥削阶级的人生观。刘少奇把孟子的话，原封不动地写进了黑《修养》，并且一有机会就宣扬升官发财、追名逐利的腐朽思想，什么“过去考上秀才就可以做官，现在加入了共产党，也可以做官”，要在“党的发展、成功与胜利中，来发展自己”等等，等等。总之，一切为了“做官”，为了“发展自己”，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什么革命，什么人民利益、党的利益，统统都可以抛在脑后。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具备的高尚品德。大叛徒刘少奇拚命推销“孔孟之道”那一套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就是妄图以此来对抗毛泽东思想，来改造党员的思想，改造我们的党，使我们的党员变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使我们的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任何反革命复辟，都是思想先行，从大造反革命舆论开始的。借古人之口，宣扬反动的政治思想，历来是剥削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孔孟之道”在中国统治了二千多年，它欺骗和麻痹人民，流毒很深，影响很广，也就是说有着它的社会基础。剥削阶级利用“孔孟之道”来制造反革命舆论，可以更具有欺骗的作用。大叛徒刘少奇之所以拚命为孔子招魂，也就是要借用孔子这具“僵尸”，利用“孔孟之道”在群众中还存在的欺骗性，来制造反革命舆论，为他篡党篡政、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道路准备条件。这也就无怪乎大叛徒刘少奇吹捧孔子、宣扬“孔孟之道”，立即博得一些剥削阶级分子的狂热喝彩，掀起了一股股尊孔复古的反革

命妖风。一九六二年，在一个所谓的孔子“讨论会”上，有人竟无耻声称：“孔孟这些思想，现在已被批判吸收，重新塑造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修养》非常杰出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这些事实，从反面进一步证明了刘少奇为孔子招魂，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的反革命政治目的。

四、把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孔子死去两千四百多年了，但是孔子的反动思想却一直阴魂不散，大叛徒刘少奇还利用来作为他篡党、篡政，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工具。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政治思想战线阶级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我们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都必须深刻认识这一点，坚决把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剥削阶级的思想是不会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灭的。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剥夺了剥削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摧毁了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但不能没收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被推翻以后，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剥削阶级总是要保持并且利用他们剩下的这块“世袭领地”，来同无产阶级作拚死的斗争。其手段之一，就是为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翻案，把腐朽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加以乔装打扮，冒充马克思主义，来向无产阶级进攻。可以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切剥削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个规律。大叛徒刘少奇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就停止了么？不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还

要长期地进行下去，直到剥削阶级的思想被彻底消灭。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夺权同无产阶级反夺权、资产阶级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不但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要进行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使它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真正做到“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政治思想的大革命，经过这场伟大的革命，我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正在发生深刻的革命的变革。但是，斗争还是长期的，而且是会有反复的。我们一定要把这场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要抓紧革命的大批判，用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党内、革命队伍内部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用毛泽东思想把上层建筑的各个阵地占领下来，改造过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我们的时代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思想体系腐朽没落，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在全世界日益深入人心的时代，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让大叛徒刘少奇和一切剥削阶级去哭泣吧，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原载一九六九年九月五日《解放军报》）

刘少奇为什么要为孔子招魂？

史 锋 史红青

半个世纪前，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对孔家店的迷信。这个口号变成了广大群众的革命口号，是中国思想界在历史上的新飞跃。

五四运动以前，孔家店统治着中国的思想界两千多年，孔子一直被剥削阶级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

孔子生活在中国奴隶社会末期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他眼看奴隶社会即将崩溃，提出了一整套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维护奴隶制度的教条。

孔子并没能够阻挡历史的潮流。奴隶制度分崩离析了，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

封建社会建立了，逐步稳定了。封建地主阶级需要建立一种思想体系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巩固他们的统治。孔子的教条被地主阶级看中了。因为，孔子的教条本质上是维护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群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在这一点上，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和它的继承者封建地主阶级是一致的。于是，封建地主阶级按照自己的利益，对孔子的教条作了注释，把它当成至高无上、不可触犯的封建经典。孔子这具僵尸被抬了出来，封为显赫无比的“至圣先师”、

“万世师表”，得到历代封建帝王的进谒、祭祀。孔子成了封建统治的有力工具，孔家店的教条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提出以后，围绕着打倒孔家店和保护孔家店的问题，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的统治，但是，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家店成为我国思想界最顽固的堡垒。这一点是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有关的。在我国，封建文化和封建政治一样，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很软弱。“在‘五四’以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中国无产阶级作为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后，资产阶级文化就一头栽进帝国主义的怀抱，并与封建文化结成反动同盟，共同反对无产阶级新文化。从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就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修正主义反动文化同盟的斗争。

历史上任何反革命复辟，总是以思想文化方面的复古为先行的。中国历代反动统治者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和镇压革命运动，总是利用“孔孟之道”，大搞尊孔活动。他们把孔家店神秘化，鼓吹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竭尽全力地吹捧和神化孔子。辛亥革命以后，每一次尊孔复古活动，往往是反革命复

辟的前奏。袁世凯、张勋、蒋介石无一不是尊孔读经的狂热鼓吹者。鲁迅曾精辟地剖析了这一历史现象，他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袁世凯想用这块“敲门砖”敲开皇宫的大门，登上皇帝的宝座。张勋拖着他的长辫子，想用这块“敲门砖”让宣统复辟，做他的大将军的美梦。蒋介石抱着“六经”，对孔子顶礼膜拜，是为了维护他的反革命专政。他们都失败了。他们的尊孔活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毛主席这样一个指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步封建帝王、独夫民贼的后尘，为孔家店招魂，大造反革命舆论。

刘少奇早就是孔子的崇拜者，一贯吹捧孔子，极力宣扬“孔孟之道”。刘少奇大肆贩卖孔家店的教条和推行他那套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需要。他那套唯心主义的“修养”经，就是“孔孟之道”的翻版。你看，孔子的“爱人”、“不好犯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学而优则仕”等，与刘少奇的“人类之爱”、“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读书做官论”等，不是一路货色吗？！所不同的只是刘少奇将这些破烂货贴上了党性“修养”的标签而已。刘少奇就是妄图使广大党员沉浸在“孔孟之道”的迷魂汤中，愈养愈“修”，修成任凭他摆布的“驯服工具”和奴才，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一九六二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认为时机已到，猖狂地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再次抛出他的黑《修养》，推销孔家店的黑货，为孔子招魂。这是刘少奇为复辟资本主义所作的反革命舆论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谁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想把中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刘少奇一伙正是这样的一批人。在政治上，“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所以，他们在贩卖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的同时，贩卖孔子的教条，把孔子这具政治僵尸拉出来是毫不为奇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刘少奇所要“演出”的“历史的新场面”，不是什么进步的东西，而是妄图使中国历史大倒退。

对于刘少奇的尊孔、宣扬“孔孟之道”的用意，那些梦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心领神会的。霎时间，尊孔复古的妖风甚嚣尘上。北京的“三家村”鼓吹学习孔子的“克己复礼”，山东曲阜的孔庙麇集了一批资产阶级专家向孔老二顶礼膜拜。山东“朝孔会”上就有人为刘少奇吹捧孔老二拍案叫好，说：“孔孟这些思想，现在已被吸收，重新塑造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修养》里非常杰出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无独有偶，一个美国资产阶级政客也说：“按照刘少奇的说法，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通过自我修养，通过‘慎独’来训练自己。”这些家伙情不自禁的喝彩，恰恰道出了刘少奇为孔子招魂的罪恶目的：用孔子那些维护剥削阶级的教条来改造共产党人和麻痹革命群众，以实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

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倒转，革命的洪流将冲垮一切绊脚石滚滚向前。有复辟活动，就有反复辟的革命去粉碎复辟的阴谋；有尊孔的反革命舆论，就有反孔的革命舆论去粉碎反革命舆论。一切反动势力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当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妄想借用孔子这具僵尸，实现他做“洪宪皇帝”的美梦，结果落得个身败名裂；而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妄图用孔子这块“敲门砖”打开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门，结果被清除出来，同样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原载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叛徒、汉奸、特务王明为什么 要替孔子翻案？

横沙岛“八·二六”大学写作组

王明这个早已为中国人民唾弃了的苏修豢养的走狗、叛党叛国的汉奸、特务，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秉承了苏修新沙皇的反革命旨意，跳出来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被打倒了的孔家店翻案。他好象一只哈叭狗发出几声嚎叫，以显示一下自己的存在。

王明本来就是从狗洞里钻出来的叛徒。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他是中国共产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他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和历来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一样，总要从孔家店这一反动思想宝库中拣些破烂向革命进攻。

王明为孔家店翻案由来已久，早在抗战时期，他就抛出了一篇黑文，胡说：中国“五千年的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真正发扬着忠、孝、仁、勇、礼、义、廉、耻”、“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其实，“忠、孝、仁、勇、礼、义、廉、耻”本来就是孔家店的黑货，独夫民贼蒋介石利用它为反共卖国制造舆论，把它法西斯化，作为“立国的纲维”，要人民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尽忠、尽孝。而王明却把这批经过蒋家王朝加工了的孔家店的黑货贴上“民族精神”等标签大肆贩

卖，并把它吹嘘成“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把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吹捧成“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吗？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呢？在当时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怎样才是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这种反压迫、反侵略的斗争精神，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决不是什么“忠、孝、仁、勇、……”束缚人民不斗争、不反抗这一类反动统治阶级的说教。当时，面临日寇这种“外来民族的压迫”。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走武装抗日的道路，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用反抗的手段来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这才是发扬中华民族的革命“优秀传统”。全国广大工农兵和亿万革命群众，就是在毛主席的武装抗日的伟大方针指引下，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为光复旧物前仆后继，进行着百折不挠，气壮山河的英勇抗日战争。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王明跳了出来，一面和蒋该死唱同一个调子，大肆鼓吹孔家店的“忠、孝、仁、勇”之类黑货是什么“民族优秀传统”，一面无耻吹捧蒋该死是民族的“领袖”，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猖狂对抗、破坏毛主席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鼓吹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要“一切经过”、“一切服从”、“一切为了”国民党反动派，向蒋介石“尽忠”“尽孝”。

毛主席早就指出：“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

的后备军”。王明为孔家店翻案，不仅是为了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家王朝“尽忠”、“尽孝”，也是为了进一步向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历史证明，一切反革命派都是尊孔派，一切卖国贼都是尊孔派，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利用代表反动统治阶级利益的“孔孟之道”，以实现其反革命目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奴役中国人民，极力鼓吹“孔孟之道”是“中国古有文化的结晶”，“应该发扬”，梦想中国人民“发扬”孔孟的“忠恕”之道，“宽恕”他们的侵略暴行，听其蹂躏，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美梦。大汉奸、大卖国贼曾国藩、袁世凯以至蒋该死之流，为了卖国求荣，一方面残酷地镇压人民反侵略斗争，一方面大造反革命舆论，尊孔复古，祭起“孔孟之道”这面破旗，要人民对侵略者讲“仁”讲“义”，以便他们放手大干出卖国家、出卖民族利益的反革命勾当。王明在抗战期间疯狂为孔家店翻案，胡说孔家店的“忠、孝、仁、勇、礼、义、廉、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要“发扬”，分明是继承了曾国藩、袁世凯、蒋该死的反动衣钵，与蒋贼反共卖国相呼应，制造反革命投降舆论，要人民放下武器，向日寇尽“忠”、尽“孝”，谈“仁”、谈“义”，为日本法西斯侵略扩张效劳卖命，一副汉奸狗嘴脸昭然若揭！

王明这个叛徒、汉奸，主子更换，狗性不移。在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以后，王明再次叛党叛国投靠苏修叛徒集团，充当新沙皇反华、反共的吹鼓手。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粉碎了新沙皇妄图在中国推行殖民主义的反革命阴谋，因此，它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一面穷凶极恶地攻击这是“毁灭一切”，为失败的阶级发出哀鸣；一面阴谋策划对中国的侵略战

争，妄图实现社会帝国主义扩张野心，它还继承了日本法西斯的衣钵，一面诉诸于屠刀，一面求助于孔家店的幽灵。胡说：孔子“学说”在今天还具有“进步意义”，妄图用这一精神鸦片烟来麻痹、瓦解中国人民的斗志。主子一呼，奴才赶紧跟上，叛徒、汉奸王明对此心领神会，气急败坏地跳了出来为孔家店大举翻案，再次祭起“尊孔”黑旗，如丧考妣地痛悼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摧毁了的孔家店，把腐烂了二千四百多年的孔子僵尸吹捧为“堂堂夫子”，妄图用孔家店的“温、良、恭、俭、让”“忠恕之道”，用孔孟的“仁爱”、“汎爱众”的阶级调和主义欺骗和毒害中国革命人民，不去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以实现其把中国变成新沙皇的殖民地的罪恶阴谋。

王明和他的主子新沙皇，求助于过去的亡灵，正表明了气息奄奄的现代修正主义已日暮途穷，一天一天烂下去了，腐朽不堪之至。“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他们的反动本性丝毫也不会改变，总是要捣乱，失败，再捣乱，进行反华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再失败，直至灭亡。历史辩证法是无情的，王明及其主子新沙皇出于反革命的需要，千方百计为孔家店翻案，但孔家店这一破烂货绝对挽救不了他们的灭亡命运，他们必将随着孔家店遗臭万年！

孔子的阴魂不散说明了什么？

史 坚 斌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正在和以“私”字为核心的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精神面貌起了深刻的变化。

但是，行将灭亡的剥削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它的这一块最后的地盘，他们竭尽全力，保护他们的思想体系及其代表人物。保护孔家店，就是他们的垂死挣扎的表现。最近，苏修豢养的走狗、叛党叛国的老机会主义者王明，就象自己被踩着了尾巴一样，大声嚎叫起来，充当了孔家店的护法神。

孔子的阴魂不散。阶级斗争的这一现实，又一次向我们敲起了警钟。

叛徒王明跳出来为孔子翻案并不奇怪，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孔子所代表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流毒并未肃清，它还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负隅顽抗。

例如：

孔子儒家的那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观点，在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遭到群众的批判

以后,不是又用“读书无用论”的形式,继续停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兴妖作怪吗?所谓“无用”,那是因为“学而优则仕”的渠道被堵塞了,读书做官的老路走不通了,因而在一些人的脑子里,便得出了“无用”的结论。如果能够得“仕”做“官”,在他们看来,读书岂不又“有用”了吗?

孔子儒家的那套轻视劳动、脱离劳动的反动思想,至今也仍然还在一些人的头脑里起作用。他们借口“面向工矿”,还搬出“中专技校特殊论”,反对上山下乡,抵制参加农业劳动。

孔子儒家的那套“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修养格言,也影响了革命造反派中的某些意志薄弱者。他们认为“大权到手,革命到头,现在该是享受一下的时候了”。甚至有人满腹牢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说穿了,就是要“论功行赏”,伸手捞名利,争地位。

……

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它究竟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它说明了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战胜一切剥削阶级思想。

剥削阶级总是要乞助于孔子的幽灵, 实行反革命复辟

孔子出身于春秋时代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开始时做过吹鼓手,后来在鲁国做了大官,又办过私塾。他是中国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是最反动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剥削阶级的思想代表。

两千多年来,从封建皇帝到近代军阀,从国民党反动派到

混在共产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都要利用孔子的反动思想，作为维持其血腥统治，腐蚀人民思想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在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时候，就通过他的御用文人提出：要在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以此来博得地主资产阶级的拥护。

一九二七年，人民公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了巩固其新军阀的专制统治，这个双手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大刽子手，效法历代帝王，跑到曲阜“朝圣”，大捧孔子为“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

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在他的篡党、篡政的反革命生涯中，更是一再地替孔子的亡灵招魂。

一九五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少奇就露出了他的不可告人的野心，也学着历代封建帝王，学着人民公敌蒋介石，匆匆跑到曲阜“朝圣”。更有甚者，他还摆出一副想做皇帝的架势，想按照宋真宗、清康熙等封建帝王“朝圣”的模样，也搞一个“驻蹕亭”。

一九六二年，刘少奇进一步暴露了他的篡党篡政的野心。正当蒋介石在台湾叫嚣要用“孔孟之道”来对中国人民进行“全面的思想战、文化战、主义战”之时，正当蒋介石叫嚣要窜犯大陆之时，刘少奇第三次抛出了他的黑《修养》，拚命鼓吹孔子思想，要中国人民对阶级敌人“宽大”、“容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中国人民放弃同蒋介石反动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和蒋介石在台湾搞“孔孟学会”相呼应，刘少奇又组织了大批牛鬼蛇神，到曲阜搞了个“孔子逝世二千四百四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丧心病狂地

向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示威。主子和奴才，一唱一和，演了一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双簧丑剧。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彻底打垮，帝、修、反在中国实行复辟的迷梦遭到破产的情况下，叛党叛国的王明，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终于按捺不住，跳将出来，为孔子招魂。其险恶用心，就是为了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扑，就是为了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恢复黑暗的旧中国。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濒临灭亡的剥削阶级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刻，在他们企图窃取权力，或是维护其将要失去的权力时，总是要抬出孔子这具僵尸，请出孔子这个亡灵，来作为救命稻草的。

孔子这具僵尸，之所以能够成为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所使用的武器，是因为孔子的思想，一直就是为剥削阶级、剥削制度辩护的工具，一直就是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武器。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之所以至今仍然要使用这个武器，则是因为二千多年来，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一直用“尊孔读经”来散布孔子的思想，欺骗人民。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推翻了中国二千多年来对孔子的迷信，这是一个极伟大的事件。但是，时至今日，孔子的思想并没有彻底批臭，在有些人头脑中的那个孔子，并没有打倒。

垂死的剥削阶级千方百计进行复辟活动时，总是要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首先打开缺口。不打倒“私”字，资本主义就有可能借“私”还资本主义之魂。腐烂了二千多年的孔子，还有人为他翻案，打倒了才三年的刘少奇之“尸”，难道就不会被借来还魂了吗？这种情况，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是长期的

孔子这具僵尸已经埋葬了二千四百四十七年。二千多年的漫长岁月，孔子的尸骨早已腐臭、烂光，中国的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孔子的思想，却远远没有彻底肃清，而是改头换面，依然顽强地表现出来。

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以“私”字为核心的剥削阶级思想变得越来越臭了，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却变得越来越荫蔽，常常是用漂亮的外衣装饰，使人们不易察觉，而它则乘人不备，侵入人们的头脑。有一些深受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工农群众，在面对面地对敌人斗争时，是切齿痛恨敌人的。但是对穿着漂亮外衣的各种各样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有些同志却往往不易识破，因而受到蒙蔽或毒害。如果我们耳目闭塞了，嗅觉失灵了，头脑昏昏然了，丧失警惕，就会被它迷住心窍。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我们同他们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

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斗争之所以是长期的，是因为反动思想经过了反动统治阶级的长期的灌输，在人们的头脑中所扎下的孽根是极深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中国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产生了孔子的思想。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继承了他的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统治思想，用孔孟之道，来巩固他们的政权。不仅如此，为了确立孔子思想的统治地位，他们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因袭了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保护孔家店，把孔子思想体系和他们从外国资产阶级那里捡来的破烂，搅拌在一起，用这种混合物作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

可见，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从奴隶主到资产阶级，都是用维护私有制，维护他们的剥削权利这根线串了起来，是一脉相承的，几千年来，他们一直在为确立他们的思想统治而努力。在无产阶级打垮了剥削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后，剥削阶级还是要千方百计维护他们的思想统治的。

反动思想统治了中国人民二千多年，而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从马克思算起，只有一百二十多年，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也只有五十年。无产阶级思想在我国占统治地位，则还只有二十年的时间。要用这样短的时间，完全清除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思想的余毒，是不可能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斗争之所以是长期的，还因为反动的阶级虽然被打倒了，但是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他们决不肯轻易地放弃意识形态这块“世袭领地”。他们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还会不断地通过各种形式，散布他们的思想毒菌，还是企图从意识形态这个领域，向无产阶级发动反攻，以实现其复辟的阴谋的。

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斗争之所以是长期的，更因为反动阶级在和我们进行斗争时，手段是极狡猾的。他们搬出了“抽象

继承”的反动理论,说什么孔子的“忠”、“节”,都是今天还应发扬的道德;鼓吹什么“仁政”也是今天所应施行的,企图用这一套来引导人们对剥削阶级尽“忠”,来宣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气节”,对抗无产阶级,鼓吹对反革命施“仁政”,以瓦解我们的革命斗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气势磅礴的伟大洪流,猛烈地冲击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阵地,给它们以致命的打击。但是,剥削阶级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还在和我們进行反复的较量。马克思说过:“陈旧的东西总是企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用新的形式填旧词,就是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种极其恶毒的手法。

所有这些,说明了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体系,两军对垒,针锋相对,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对于剥削阶级反动思想不能和平共处,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任何轻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的倾向,都是错误的。但是,思想不能没收,砸烂不能代替批判,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斗争,决不是痛打一时所能奏效的。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精神力量还得用精神力量来打倒。对于孔子思想及其他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深入的、持久的革命大批判,才能肃清其流毒。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战胜一切剥削阶级思想体系的搏斗,也不能希图“毕其功于一役”,不能“一劳永逸”。只有进行反复的、长期的斗争,才能最后战胜一切剥削阶级思想。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战胜一切剥削阶级思想

“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提出至今，已经五十年了。五十年的历史作出的结论是，只有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才能真正彻底摧毁孔家店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堡垒。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以前领导过文化运动。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当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他们为了维护其资本主义的利益，维护其剥削阶级的地位，就不断地以剥削阶级的思想，向无产阶级接连发动进攻。“保护孔家店”，也就成了这种进攻的一个重要手段。

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革命浪潮中，虽不敢公然起来反对，但是，工农革命一发展，他们就暴露了敌视工农，维护孔家店的反动面目。因为他们与剥削阶级利益是一致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绝大部分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而且是可以改造的。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由知识分子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在知识分子未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他们也不可能将摧毁剥削阶级思想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知识分子可以提出“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但不能实现这个口号，因为，他们不可能彻底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而且还常常会把他们头脑中的糟粕散布出来，危害革命，毒害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如此，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然是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所表

现出来的摇摆性，就是最好的明证。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她“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中国的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民主革命的历史证明，工人阶级不但在政治上能够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达到彻底胜利，而且只有她才能够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达到彻底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也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彻底改变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统治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现象，才能打碎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精神桎梏。毛主席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只有实行了这种专政，才能打倒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的统治。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是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最锐利的武器，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是足以对抗一切旧思想的。工人阶级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才能战胜曾统治了人们头脑二千多年的私有观念，彻底肃清几十年的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用毛泽东思想来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毒物。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批判旧世界，要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剥削阶级的一切代表人物，使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的余

毒得到肃清,使剥削阶级的“权威”在亿万人民心目中变臭,使他们失去市场。七亿人民都成了批判家,我们就能把剥削阶级的思想批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在这样的批判中,就进一步大立了毛泽东思想。

无产阶级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战无不胜的武器,就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意识形态领域占领下来,改造过来,不管是王明为二千多年前孔子这具僵尸招魂也好,还是其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刘少奇这具政治“僵尸”招魂也好,都只能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都只能说明他们穷途末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则将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原载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文汇报》)

从“敲门砖”到“垫脚石”

沙 延 望

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鲁迅，以“冲决罗网”的革命精神，综观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无情地剥掉了孔老二的虚假外衣，一针见血地指出：孔老二只不过是反动统治者手中的一块“敲门砖”！

这个迷信破得好，这个老底揭得深！历史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袁世凯，这个卑鄙无耻的窃国大盗，为了实现他做皇帝的“迷梦”，不是拾起了这块“敲门砖”吗？他一面与日本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一面则又胡诌什么“孔教之于中国犹空气之于人类”。于是乎，既祭孔、又巡礼，亲率百官、九叩三拜，大演尊孔复古的丑剧。

蒋介石，这个极端残忍、极端凶恶的人民公敌，为了建立自己的法西斯统治，也不是拾起了这块“敲门砖”吗？他在制造了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四·一二”血腥反革命大屠杀之后，就急急匆匆地赶到曲阜，念念有词地乞求孔老二的“威灵”保佑。他一会儿推销“大一统”、“王者受命于天”的反动理论，竭力为自己实现法西斯独裁统治制造反革命舆论；一会儿又兜售“四维”“八德”，搞什么“新生活运动”，企图压制革命人民

愈益激烈的反抗。

由于孔老二有“敲门砖”的妙用，所以如同鲁迅说的“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中国历来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表，出于他们不同的政治目的，虽然在孔老二脸上，涂上了一层又一层自己所喜爱的油彩，但是，总忘不了把它装潢得神圣不可侵犯，妄图迫使劳动人民当作神明来焚香膜拜。他们给这区区一块“砖”奉献尽了诸如“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称号，以及“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的头衔，真可谓“一直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则更是“青出于蓝”了。他为了“敲开”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门”，除了仿效封建帝王再演“朝圣”丑剧外，还三次抛出黑《修养》，大肆吹捧孔孟之道，再次给孔老二戴上“圣贤”的桂冠。

其实，孔老二这块“砖”，不仅可以用来“敲门”，替那些“想做权势者们”夺取政权，而且尚能为那些“权势者”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即充当“垫脚石”的作用。“敲门砖”随着主子的得势，因此也就往往成为“垫脚石”。当然，有的“权势者”起初在不得势时，由于种种原因也有不巴结这个孔老二的。但是，当他们一旦在取得了政权之后，也总是会拾起这块“敲门砖”来“垫脚”，用以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的记述：刘邦这个“高阳酒徒”在称帝前不信孔老二的“儒学”，非但如此，甚至还深恶痛绝到亲自夺下儒生的帽子撒过尿。可是当他做了皇帝后，就一反常态，马上大祭起孔老二的亡灵来。到了他的子孙汉武帝时，就更加登峰造极，干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后来的反动统治者，继承刘邦这一衣钵的，也屡见不鲜。

从“敲门砖”到“垫脚石”，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一切反动

派“尊孔”的奥妙，看透了孔孟之道的反动性和虚伪性。孔家店顽固地维护私有制，集中地代表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利益，是一切剥削阶级反革命精神力量的顽固堡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它不仅要彻底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而且要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完成“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这个伟大战斗任务。因此，在今天，对于这块被历来反动统治者用来“敲门”和“垫脚”的“砖头”，我们就更应该彻底地蔑视它，坚韧、持久地批判它，直到把它砸得稀巴烂！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

“朝圣”就是为了篡权复辟

济南部队装甲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胡秀昌

一九五一年初春，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刘少奇这条帝、修、反所豢养的忠实走狗，跑到了山东曲阜，拜谒了孔家店，演出了一场“朝圣”的丑剧。

在孔庙，这个家伙一看到孔老二的泥胎像，就无限感叹地说：“这个塑像很好，应该好好保护。”在孔林，他看到宋、清两朝皇帝立的“驻蹕亭”，马上问道：“这是干什么的？”文管会的人回答：“这是历代皇帝‘朝圣’后为纪念皇帝立的。”这时，刘少奇再也按捺不住篡权复辟的野心，竟然脱口而出：“我们也搞一个！”在孔府，他看到孔老二那份“圣迹图”，连声叫道：“孔老夫子伟大！孔老夫子伟大！”双手捧着那本“圣迹图”，爱不释手，还特地带回北京，在“刘府”里供奉了一年之久。他离开孔家店时，还一再作黑指示：“孔老夫子是圣人，人民政府也应该祭祀他”。看，刘少奇不愧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

孔老二这个春秋时代鲁国的破落贵族，是剥削阶级的忠实辩护士。他在一生中，为了挽救奴隶制度的崩溃，编造了一套压迫、统治人民的反动理论。所以，历代的封建帝王，为了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无不与孔老二这具僵尸勾勾搭搭，给他加上一大串什么“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等桂冠，把他的教条

奉为“治国平天下”之准则。相反，广大劳动人民把孔子看成是自己的死对头，把“孔孟之道”看成是毒害人民的“包着糖皮的砒霜”。

翻翻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有多少劳动人民死在这个伪装慈善的大骗子手下！拿这位“圣人”的后裔“衍圣公”来说，就是一个挂着孔老二“富民”、“利民”的招牌，干着吃人勾当的魔鬼。在我的家乡曲阜流传着这样两句民谣：“天上的星星数不清，孔家的土地查不清。”在我们附近的几个县，都有孔家的土地和庄园。听老贫下中农讲，佃户交租要先“挂号”，要拿最好的粮食交租，不然就被扣上“不尊重圣人”的罪名，或被投入孔府的监狱，或被官府“拿获”治罪。在孔家店的迫害下，有多少佃户被逼得逃荒要饭，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有多少人走投无路，投河上吊，家破人亡！这就是那个“圣人”的“仁义道德”！孔老二到底是那个阶级的“圣人”，他的“仁政”、“德治”又是什么货色，不是清清楚楚吗？“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刘少奇张口“孔老夫子是圣人”，闭口“孔老夫子伟大”，恰恰证明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死对头！

刘少奇为什么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就去“朝圣”？原来，他梦想窃国做“皇帝”，复辟资本主义。

鲁迅曾经指出，去参拜圣庙的人，大都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而“一般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历史的事实正是这样。

历代做皇帝的人，从汉武帝、唐太宗到宋、明、清的历代封建帝王，都要去曲阜“朝圣”的。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圣人”之道，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

窃国大盗袁世凯，在他篡权爬上了“大总统”宝座后不久，就亲率百官，特地到曲阜“朝圣”，妄图借助孔老二的亡灵来制造反动的舆论，以实现做“洪宪皇帝”的美梦！

人民公敌蒋介石也是这样。他在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二年，为了巩固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也特地跑到曲阜去“朝圣”，并疯狂叫嚣：“保护孔庙之意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这充分暴露了这个独夫民贼利用孔老二进行法西斯统治的反革命面目。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个披着“共产党人”外衣、并自称为中国的“刘克思”的“大人物”，也风尘仆仆地来到曲阜“朝圣”了。历代封建帝王“朝圣”后要立一个“驻蹕亭”，刘少奇“朝圣”后，同样说“我们也搞一个！”他公然要步历代封建皇帝的后尘，为自己立碑筑亭，袁世凯在“朝圣”时大叫什么要开展“祭孔”活动，刘少奇在“朝圣”时也用同样的腔调，说什么“孔老夫子是圣人，人民政府也应该祭祀他”。看，刘少奇同这些封建帝王、军阀、官僚的语言和行动是何等相似，何等一致！他们真是一棵藤上结出的一串黑瓜！

问题很清楚，刘少奇所以要选择一九五一年去“朝圣”，就是要乘我国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折的这个重要时刻，妄图借助孔子的亡灵，扭转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车轮，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他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

然而，“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阴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革

命群众起来把刘少奇这个为孔家店招魂和为一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翻案的罪魁祸首轰下了历史舞台。孔老二的幽灵破灭了！刘少奇这个篡权复辟的大阴谋家，也落了个可耻的下场！

（原载一九六九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

从“同孔子妥协”看刘少奇的叛徒嘴脸

济南部队装甲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曹满栋 钱正康

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正处在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的关键时刻，刘少奇来到了山东。他闭口不谈毛主席提出的进行抗日战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不谈反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卖国政策，却大肆吹捧孔子。他胡说什么：孔子思想“对我们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有用”，我们要“同孔子妥协”，等等。

谁都知道，指导我们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的一系列光辉著作。不是别的什么思想，更不是孔老二的思想！事实上，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那一天起，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就和帝国主义文化结成了非常亲热的伙伴，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精神武器。正因为这样，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就叫嚷什么孔子之道是“中国古有文化的结晶”，“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应该发扬孔子之道”，等等。而在当时的山东，特别是孔子家乡一带，当地的反动势力也常常抬出孔子这位“圣人”来吓人，来束缚青年男女参加抗日战争，破坏我党的抗日群众运动。如果真象刘少奇说的，孔子思

想可以用来抗日的話，那么，当一九三八年日寇的铁蹄踏进曲阜的时候，那个深得其老祖先真传的“衍圣公”，就应当出来抗日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那个“衍圣公”非但没有进行什么抗日，倒是马上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当上了汉奸、走狗。在这里，孔子思想究竟对抗日有用，还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有用，对汉奸卖国贼破坏抗日、投降变节有用，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事实证明，孔子思想就是属于毛主席所说的那种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但是，刘少奇却偏偏要我们“同孔子妥协”。他想干什么呢？

孔子是个死人。向一个死人去妥协，当然不是刘少奇的本意。刘少奇要我们同孔子妥协，就是要我们放弃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斗争，与卖国贼蒋介石妥协；放弃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与日本侵略者妥协。如果我们把刘少奇在一九三九年抛出的黑《修养》中所鼓吹的“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以德报怨”等黑货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看出，刘少奇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借孔子的阴魂来反对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的光辉思想，以便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推行其亡党、亡国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就是要我们象蒋介石那样，“忍受”丧失国家领土主权的“屈辱”，去建立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大东亚新秩序”，用给了东北、再送华北的方式去进行“以德报怨”。就是要我们象“孔府”的“衍圣公”那样，毕恭毕敬地去投降日本侵略者。一句话，就是要我们背叛革命，当一个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专政屈膝投降的奴才。

同刘少奇的叛徒哲学相反，我们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

的哲学。对一个革命战士来说，斗争就是生命，离开了斗争，不过是行尸走肉，那里谈得到真正的生命。只有那种怕死鬼刘少奇之流，才为了“钟爱自己”，“保护自己的生命与健康”，不惜拿着人民的革命事业到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商行里去拍卖，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去充当可耻的叛徒！我们无产阶级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依靠斗争，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搬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斗倒斗臭了刘少奇，把这条癞皮狗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今后，我们也一定能够斗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搬掉压在世界人民头上的这三座大山！

（原载一九六九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

砸烂孔子和刘少奇的“修养”经

驻沪空军 卫虹鹰

孔子这具僵尸，为什么被中国历代剥削阶级捧为“圣人君子”，颂称为“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是因为孔子有一套麻醉人民、毒害人民、维护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修养”经。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的“修养”经是剥削阶级损人利己的“生意经”，是资产阶级争名逐利的“私字经”，也是大叛徒刘少奇反革命的黑《修养》的老祖宗。其危害之大，罪恶之深，真是罄竹难书。

孔子的“修养”经，不管他的“立”也好，“不惑”也好，“知天命”也好，“耳顺”也好，都是为的“从心所欲”，都是为的“学而优则仕”，“一举成名”，都是为的爬到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与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是一路货。

二千多年来，从奴隶主到封建皇帝，从近代军阀到国民党反动派，一直用“尊孔读经”来作为他们维持反动统治的“法宝”。而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叛徒刘少奇继承孔子的衣钵，从故纸堆里拾起孔孟之道的破烂，修修补补，剪剪贴贴，塞进了他的黑《修养》，也是为了用它作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

辟资本主义的武器。大叛徒刘少奇自己就是这套谬论的实行者。你看他不是不到“三十而立”就立志担负“大任”，混进我们共产党里干起反革命勾当了吗？他披着卫道士的外衣，干着刽子手的勾当。在他的反革命生涯中，几次叛变投敌，不惜出卖同志，出卖革命，出卖民族利益来换取自己的狗命。他刚从反动派的狗洞里爬出来，又拜倒在帝国主义的脚下，充当帝国主义任意摆布的奴才。这就是他在黑《修养》中所宣扬的“修身养性”之道，担负“大任”之途。但他“修身养性”反革命之道，怎敌得过无产阶级革命之道，终于在年将七十的时候，这个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走狗，非但没有“从心所欲”，而是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怒涛冲刷出来了！

无数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我们，孔子的“修养”经就是一部维护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杀害劳动人民的刑具。几十年来，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工贼再三再四地贩卖“孔孟之道”，不遗余力地大肆宣扬孔子的唯心主义“修养”经，完全是出于他的反动本能，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夺回他失去的“天堂”。他借助孔子的幽灵来为他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企图让共产党员“修”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修”成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得力打手，“修”成“入党做官”，担当“大任”的官迷，“修”成不问政治，不问国家大事，不问阶级斗争的庸人。这样，他便可以任意干他反革命的罪恶勾当，达到他篡党、篡政的罪恶目的。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我们决不做“修身养性”的“儒家”，我们要做阶级斗

争的勇士，做暴风雨中的海燕，搏击长空的雄鹰，当革命的闯将。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无数的革命英雄，发扬了无产阶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为着人民的利益，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们用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的壮烈行为，给资产阶级用以安身立命的“修养”经当头一棒，宣判了从孔子到刘少奇的“修身养性”之道的彻底破产。那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正在朝着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精神世界迈进。让孔孟之道和刘少奇的黑《修养》一齐见鬼去吧！

（原载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六日《文汇报》）

孔孟的“四书”和刘少奇的黑《修养》

史 反 修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叛党叛国的罪行累累。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孔孟之道”，作为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制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的工具，大干其反革命的勾当。

这个二十世纪的自称为“老革命”的“大人物”，竟会同二千多年前的“孔孟之道”结下了不解之缘，岂非咄咄怪事！现在已经查明：一九二五年底，刘少奇被反动军阀逮住以后，立即就叛变了革命，投降了敌人。当他从狗洞里爬出来的时候，那个反动军阀还特地“赏赐”给刘少奇一部“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要他“好好去读”。自此之后，刘少奇就双手捧着这部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后来又一直为封建地主阶级所利用的“经书”，开始了他的反革命生涯。在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九年、一九六二年，连续三次抛出他精心炮制的黑《修养》，大肆宣扬“四书”里反动的“修身养性”的方法，拚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反动经典“四书”的核心内容，刘少奇在黑《修养》里搜罗无遗。刘少奇在黑《修养》中念念有词的“慎独”，来自于《中庸》；刘少奇特别标榜的“吾日三省吾身”，是《论语》中孔老二学生曾子的一句话。黑《修养》里所引用的十多处“孔孟之道”

的“训语”、“格言”、“座右铭”，全部来自于“四书”或者历代阐述孔孟之道“经典”的注释。这些所谓“修己”、“慎独”、“吾日三省吾身”，都是所谓孔子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这种“基本精神”是彻头彻尾为培养封建统治阶级的走狗服务、为镇压人民、剥削人民的反革命统治服务的反革命精神！这是一种极为阴险、极为虚伪、极为残忍的反革命精神！

“四书”中重要的一部书《论语》，是中国春秋时代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孔子的一部讲话记录。这是孔子为了挽救奴隶制度的崩溃，挽救奴隶主阶级的灭亡而发出的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哀鸣，它本来是奴隶制度崩溃的记录。但是从汉朝董仲舒开始，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发现它对维护、巩固封建统治有用，就千方百计地按照封建地主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孔子，借孔子的亡灵来维护封建制度。这种情况发展到了宋朝，封建御用文人朱熹注释“四书”，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谓“宋明理学”中的儒家的基本精神，说穿了，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假仁假义。举例来说，刘少奇一再宣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封建社会中，本来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对付革命人民的一帖麻醉剂，是他们残酷镇压革命人民的一块遮羞布。“仁慈”、“仁政”和残忍、暴政，是他们的反革命两手。他们用这种虚伪而反动透顶的所谓“仁慈”、“仁政”的伪君子面目把自己打扮起来，为的是掩盖他们更残忍、更阴险地进行反革命统治的罪恶目的。

远的不说，清朝的大汉奸、大刽子手曾国藩，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残忍和虚伪的两手结合得十分“高明”的反革命典型。此人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双手沾满了鲜血；但他又极端虚伪，大讲“修身养性”、“克己复礼”，有一套“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反动功夫。遗臭万年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也是这种既虚伪又残忍的反动派的典型。这个独夫民贼是曾国藩的忠实信徒，一有空闲就披阅《曾文正公全集》，从中学学习虚伪和残忍的反革命本领。他一方面极端残忍地镇压革命运动，双手沾满了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另一方面，无耻的“礼义廉耻”的虚伪言词又不离嘴边。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他们“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总而言之，从曾国藩到蒋介石，他们的大地主、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们的残忍；而反革命统治的需要，又要求他们以“仁义道德”的伪装面目出现，孔孟的“四书”所提供的虚伪与残忍相结合的反革命两面统治的权术，正适合了他们这伙反革命的需要，成为他们手中的反革命“法宝”。

刘少奇比起他的前辈曾国藩、蒋介石来，不仅是全盘继承了他们的反革命本领，而且更进了一步。他把“四书”中贩卖的反革命两面统治术的核心，溶化到他的黑《修养》里去，同时，更渗进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黑货。比起孔老二一伙的“四书”来，刘少奇的黑《修养》毒汁更多。更有甚者，刘少奇在贯彻这种反革命策略和任务的实践方面，也较之他的先辈高了一筹。他多次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出卖组织，破坏革命，罪行累累。但是，却装作“坚不吐实”的正人君子，削尖脑袋，伪装自己，重新钻到我们党里来，并且篡夺了党和国家的一部分权力，妄图把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转变成成为资产阶级专政，干着他的主子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所想干而不能干的反革命勾当。他凭借着这种极为虚伪和残忍的反革命经验和手段，在我们党内隐藏达四十多年之久。他的反革命“道行”真是修炼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但是,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任何阴险的反革命分子都没有好下场。“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刘少奇先辈曾国藩、蒋介石早已一一垮了台。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这个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也终于被亿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从政治上宣判了死刑。刘少奇的反革命的黑《修养》和孔老二之流的“四书”,也被革命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原载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八日《解放日报》)

尊孔·修养·复辟

——从黑《修养》的三次出笼看刘少奇篡党篡政的反革命阴谋

华 史 斌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中外历史上任何反革命阶级的复辟，总是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出于他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使出浑身解数，钻进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中外古今剥削阶级腐朽不堪的思想宝库，捡来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破烂，四处兜售，八方贩卖，大造反革命舆论。在刘少奇兜售的这堆破烂中间，占着重要地位的就有他从孔家店拾来的“孔孟之道”。对于“孔孟之道”，刘少奇不仅到处散布，而且还大量大量地塞进他的得意之作黑《修养》中。因此，揭开黑《修养》三次出笼的黑幕，我们就可以看出刘少奇的丑恶灵魂和狼子野心。

一九三九年，日本法西斯强盗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兽军所至，哀鸿遍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适应日本帝国

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刘少奇一方面和王明在一起，推行一条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取消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另一方面，抛出他精心炮制的黑《修养》，作为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升阶”。在这本黑《修养》中，刘少奇根本不谈抗日战争，不谈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却从孔孟的“经书”中批发了一大堆“格言”、“训语”和“座右铭”之类的黑货，大谈其反动的修身养性之道。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什么“慎独”、“忠恕”，乌七八糟，比比皆是。

何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刘少奇的话来说，就是要我们“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体贴人家”，“毫无报复之心”。刘少奇鼓吹这套虚伪的剥削者说教，就是要人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实行灭绝人性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毫无报复之心”，不“报复”，不反抗。这是什么哲学？纯粹是丧权辱国的民族投降主义腔调！

何谓“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就是“忍”受半壁河山沦于敌手的屈“辱”，“求”得中日“共荣”的“大东亚秩序”之“全”。这是什么哲学？纯粹是汉奸卖国贼的亡国语言！

“心有灵犀一点通。”刘少奇说，孔子之道是“我们有用的遗教”。日本法西斯的御用文人，则叫嚣“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就“应该发扬孔子之道”。一主一奴，一唱一和，里应外合，步调又是何等合拍！

一九四九年，中国大地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民主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时，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民主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后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提出了建立和巩固

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纲领。毛主席指出，国内的基本矛盾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毛主席号召“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革命的转折关头，最容易识别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在全国解放前夕，刘少奇仰承资产阶级的鼻息，将他那本发了霉的《修养》经过一番“修改校阅”，再次抛了出来。刘少奇闭口不谈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闭口不谈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却十分起劲地重弹“修养”的滥调，大肆贩卖孔孟黑货。从所谓“成仁”“取义”“以德报怨”，到什么“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从所谓“能爱人，能恶人”，到什么“慎独”，“诚意，正心，修身，……平天下”，翻来复去，津津乐道。

好一个“以德报怨”！刘少奇要向谁“以德报怨”！他同年在天津的一次讲话中有一个绝妙的注释，他说：“有一部分人……当上了工头，直接和工人冲突，引起了工人的反对”，引起了工人的“怨恨”。应该怎么办？刘少奇便抬出“孔孟之道”，要工人以孔孟“忠恕”之“德”，“既往不咎”，“谅解”反动工头。广而言之，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几十年来，刘少奇就是用他这种工贼的哲学出卖无产阶级利益，向资产阶级献媚投降！

“正心，修身，……平天下”，妙极了！一语泄露了天机：刘少奇鼓吹“正心，修身”亦即“修养”的目的在于“平天下”。“天下”者，国家也。刘少奇心目中的“天下”就是“资本家眉开眼笑”的资产阶级专政，就是他能充当美帝国主义的“红色买办”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就是剥削阶级的天堂，劳动人民的“地狱”！刘少奇就是要用“修身养性”之类的剥削阶级统治术“平”出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天下”。

阶级斗争的浪潮一个接着一个。刘少奇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也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灭。可是，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一九六二年，在这个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剧烈、尖锐的时刻，老反革命刘少奇又再次抛出了重新打扮的黑《修养》。他要人们学习“圣贤”的遗教，去“修身养性”，要革命人民对一切人“将心比心”，“切磋琢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句话，要行“忠恕”之道，要搞阶级合作。

当时，刘少奇在国际上竭力推销“三降一灭”的投降主义黑货，在国内煽阴风，点邪火，大力鼓吹“三自一包”，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活动。他抬出孔子这具政治僵尸，就是妄图转移革命人民阶级斗争的视线，腐蚀革命斗志，在阶级敌人猖狂的复辟活动面前放下战斗的武器，对他们施行“仁政”，从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六二年，在刘少奇的总导演下，在山东曲阜演出一出“尊孔复古”的大黑戏。在黑会上，牛鬼蛇神津津乐道地胡诌什么：“孔孟这些思想，现在已被吸收，重新塑造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修养》里非常杰出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在会外、在农村，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大续封建家谱，大搞封建宗法复辟活动，向贫下中农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

无独有偶，山东“拜孔会”开场前后，龟缩在台湾的蒋匪帮也向孔子招魂，举办“孔孟学会”，与黑《修养》及山东“拜孔会”，遥相呼应，叫嚣什么：“当此……举世动乱不安的时代，更需要实行孔子思想”。黑《修养》出笼，美帝国主义者也拍案叫绝。一个美帝国主义分子说：“按照刘少奇的说法，一

个好的共产党员一定要通过自我修养，通过‘慎独’来训练自己。”国内外阶级敌人对孔老二的顶礼膜拜，对黑《修养》的尽情赞美，这恰好说明了：刘少奇再次抛出黑《修养》，兜售孔子的破烂货，完全是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需要！

刘少奇三番五次地抛出黑《修养》，就是妄图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沉浸在孔子之道的麻醉剂中。尊孔为了非今，修养为了复辟。尊孔——修养——复辟，这就是贯串在刘少奇那本反革命黑书中的一条黑线。

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命运，也还是仍旧沉下去。”在中国人民革命中，反映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诸如“孔孟之道”这些“沉滓”，泛起过不知有多少次，但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面前，都终究逃不出“沉下去”的命运。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肆宣扬“孔孟之道”，同样落得个“沉下去”的可耻下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孔子的幽灵、二十世纪的“四书”——黑《修养》连同“孔孟之道”的鼓吹者、大叛徒刘少奇，统统都被革命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原载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八日《解放日报》）

孔子的“仁”和刘少奇的 “老人心肠”是一路货

上海国棉三十厂 冯慧芬

两千多年以来，一切剥削阶级把孔子的“仁”吹得天花乱坠，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更把孔子的“仁”视为“珍宝”，大肆宣扬提倡“老人心肠”。孔子的“仁”和刘少奇的“老人心肠”究竟是什么货色？我们必须加以拆穿。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孔子讲，“仁”是“爱人”。这个话完全抽掉了阶级内容，是对劳动人民的欺骗。孔子满嘴“仁”、“爱人”，但他爱的是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他讲“仁”，而对被剥削阶级，他就要进行镇压，就不讲“仁”，也不“爱人”了。历来的剥削阶级之所以都把孔子的“仁爱”抬得八丈高，就是用这块遮羞布来残酷剥削劳动人民。他们对人民敲骨吸髓，表面上却装得道貌岸然。《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黄世仁，不是就在他家里的佛堂上挂起了“积善堂”的大匾吗？他们能积什么“善”？他们的“善”浸透我们劳动人民的血和泪。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鼓吹“要有老人的心肠”，大谈剥削阶级的“人类之爱”，和孔子讲的是一路货。他讲的“要有老人的心肠”，就是要我们对那些

已经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讲“仁爱”，讲“宽容”。为了要我们工人对资本家讲“仁爱”，讲“老人的心肠”，他千方百计地鼓吹资本家“剥削有功”，资本家不剥削，“工人就没有饭吃了”，等等。这真是一派胡言！解放前，我们厂有个老工人要生孩子，资本家却不准她休息，否则就要开除。这个老工人为了维持生活，只好硬撑着干，结果孩子生在马路上。这就是资本家的“仁爱”！在旧社会，地主对农民，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越多，劳动人民就越贫困，家破人亡的就越多。地主、资本家从来就是把自己的荒淫无耻的生活建筑在劳动人民的血泪之上的。刘少奇今天要对剥削阶级讲“老人的心肠”，讲“仁爱”，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对他们讲“仁爱”，就会忘记了过去的阶级仇，就是对人民的极大犯罪，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孔子提倡“仁”，刘少奇提倡“老人心肠”，他们有一个论调，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刘少奇的话来讲就是“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体贴人家”。刘少奇指的“人家”，不是别的，正是一切剥削阶级。刘少奇讲的“体贴”，就是要我们对阶级敌人也要讲“仁政”，讲“以德报怨”。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对于敌人就是要讲斗争，就是要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你不斗他，他就斗你；你不打他，他要打你。如果我们听信大叛徒刘少奇的话，对阶级敌人讲“仁政”，那就不得了！我们厂里就有个反动资本家，解放后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

路线的包庇下，爬上了“副区长”的宝座。但是这个资本家的反动的阶级本性丝毫也没有改变，时刻想变天。在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叫嚣要“想想过去，比比现在”，充分暴露了他妄图搞反革命复辟的狼子野心。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对阶级敌人施“仁政”，就会象毛主席告诫我们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从孔子的“仁爱”，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到刘少奇的“老人心肠”，统统都是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遮羞布。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把这些垃圾彻底扫除，彻底肃清其余毒！

（原载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

拆穿“仁”的假面具

川沙县龚路公社 华炳新 葛文新

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孔子为了维护他的反动统治，大肆宣扬“仁”之类的黑货。孔子恬不知耻地讲“仁”。其实，他爱的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反动统治阶级讲“仁”，而对被统治的劳动群众，他就要进行镇压，就不讲“仁”了。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了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也拚命地鼓吹“宽容”、“将心比心”等破烂，刘少奇与孔子讲的完全是一路货色，真是一派胡言！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孔子宣扬的“仁”，刘贼鼓吹的“宽容”，就是宣扬抽象的超阶级的“人类之爱”。天下乌鸦一般黑，世界上哪一家地主爱过我们贫下中农？哪一个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施过一点什么“仁”？我们广大贫下中农的血泪史就是对地主、国民党反动派的最有力的控诉，是对孔老二、刘贼宣扬的“仁”的反动谬论的最有力的批判。

我们公社启明大队有个老雇农，解放前给地主扛长工，他的妻子养小囡时，只能用草头当营养菜，有时饿得实在难受，只好躺在床上。小囡生下没两天，残酷的地主婆硬要她当奶

妈，自己小因吃不到亲生母亲的奶，瘦得皮包骨，地主的小因却养得白胖胖。这那里是地主的小因在吃我们贫苦农民的奶水，实在是吸我们贫下中农的血浆，这就是地主阶级对我们贫下中农的“仁”！

明明是婊子，偏要立牌坊。解放前，我们村里有一个贫农经过伪保长的门口，这个家伙正在强奸幼女，怕现原形，就来个“贼喊捉贼”的毒计，硬诬这个贫农是强盗，把他抓走了，那个贫农反复申辩：“我不是强盗，和我一起做工的还有五人可作证。”就这样，这五个贫下中农统统被抓去吃官司，其中四个被无故杀害。无罪的贫下中农被活活地残杀，有罪的伪保长却逍遥法外，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身上体现的孔子的“仁”。

几千年来阶级斗争的历史，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一切剥削阶级是不会对劳动人民施“仁政”的，因此，我们无产阶级也决不能对他们施“仁政”，我们不能去“爱”他们，正如他们不爱我们一样。对付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他们永远不得翻身。

从黄世仁、刘文彩到我们村里的大地主，尽管他们可以嚣张一时、欺压贫下中农，凶恶之极，梦想在贫下中农尸骨堆上发财致富，但结果还是碰得头破血流，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如今，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面前，刘少奇妄图使贫下中农对地主讲“仁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也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取灭亡。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背叛。对于敌人我们决不施仁政，你不斗他，他就

斗你，你不“疾恶如仇”，他却“见你如仇”，你放过他，他却不会放过你。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但一小撮阶级敌人还是“黑甲鱼剖腹心不死，癞蛤蟆剥皮眼不闭”，当他们越来越孤立时，便更加垂死挣扎，蠢蠢欲动，他们抗拒改造，破坏生产，大搞投机倒把，有的不止一次地谩骂贫下中农，殴打革命干部，甚至气势汹汹地扬言要杀人。对于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我们贫下中农能不能施什么“仁政”，说什么“宽容”？我们的回答是：“不能！不能！！不能！！！”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专政！专政！！专政！！！”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是要实行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

（原载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六日《文汇报》）

在“仁爱”背后的血淋淋杀机

鲁迅说过：“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他们之所以“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是为了用孔子作“‘敲门砖’的差使”。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竭力鼓吹孔孟之道，就是要用孔子来做一块敲开资本主义大门的“敲门砖”，实现他反革命复辟的梦想。

孔子这个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一生中大力宣传“仁”的学说，“仁”成为孔子哲学思想的核心。他自己对“仁”的解释是：“爱人”。刘少奇把它搬出来，就是用来作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刘少奇在黑《修养》中，鼓吹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个人都应该“将心比心”，“要发展自己，提高自己，就必须同时发展别人，提高别人”等等，全是孔子“仁”的破烂货。在这所谓“仁爱”的背后，掩盖资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血淋淋进攻的杀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口号，自它被提出之日起，从来就不是一个超阶级的口号。孔子所处的时代，广大奴隶与奴隶主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复杂，他提出这样的口号，正是为了麻醉和欺骗劳动人民，力求使他们安份守己，不要“犯上作乱”，从而维护反动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是不愿从事半点劳动，不

愿意放弃他们一丝一毫的剥削，这是他们的“不欲”，他们为了维持自己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生活，就拚命地压榨劳动人民，在这里，他们的“不欲”绝不是“不施于人”，而是必施于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在阶级社会中，在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刘少奇鼓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要我们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动派施“仁政”。他叫嚷要“将心比心”，“发展别人，提高别人”，就是要我们忘记阶级，忘记阶级斗争，对阶级敌人讲“亲热”，表“温和”，在人民内部取消积极的思想斗争。而这一切都是适应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需要。它的剥削阶级性质是十分鲜明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内，无产阶级对于阶级敌人，根本不讲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要彻底打倒他，消灭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在革命人民内部，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也决不能抹杀、调和。不然的话，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就会大肆泛滥，无产阶级专政也就不可能巩固。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时刻牢记毛主席的这个伟大教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认真搞好斗、批、改，把思想文化这个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彻底改造过来，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选自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大批判专栏）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解放日报》）

伪善者的哲学

欺骗和伪善，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本质特征之一。作为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思想的“孔孟之道”，为统治阶级隐恶遮丑，充满了欺骗和伪善的说教。孔家店里的_人物，无论是大老板还是小伙计，都是伪君子即两面派。他们吹的是一套，干的又是一套。

孔子、孟子一伙都是伪君子。他们一面说：“仁”是“爱人”，一面却自始至终污蔑劳动人民为“小人”，说什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叫嚷：“犯上作乱者，诛。”他们一面主张“穷则独善其身”，一面却到处拉关系，企图加官晋禄。特别是孔子这个“至圣先师”可算得是一个欺骗和伪善的典型！

人民公敌蒋该死，深得孔孟之道两面派的真髓，他一面鼓吹“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大演“朝圣”丑剧，搞什么“新生活运动”；一面残酷屠杀革命人民，出卖民族利益。这个旧上海的流氓，交易所的掮客，法西斯的魔王，就是一个十足伪善和残忍的化身。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自称是“工运领袖”，实则出卖工人利益，是个大工贼；明明在反动派的狗洞里爬进爬出，是个大叛徒，偏要打扮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还讲什么要“学习我国历代圣贤的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真可谓集历史上一切反革命两面派衣钵之大成。

但既是伪善，最终难免暴露真相。因此，一切剥削阶级的

代表人物包括刘少奇在内，被革命人民所抛弃，那是必然的。“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

（选自上海市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
校十一连革命大批判专栏）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文汇报》）

是“爱人” 还是“吃人”

——孔子的“仁”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红 戈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孔子出身于破落奴隶主贵族家庭，他的思想代表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作为孔子的思想核心的“仁”，就是维护奴隶制统治的反动思想。孔子提出的“仁”，是极端虚伪和反动的。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其实，他爱的是反动统治阶级，而对被统治的劳动人民，他就要骂为“小人”，是根本不爱的。另一面，孔子提出“仁”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被统治的劳动人民去“爱”反动统治阶级，去遵守奴隶主的统治秩序，安分守己，不反抗，不斗争，永远甘心为奴隶，从而延缓奴隶制度的灭亡。

我们从“衍圣公府”这座孔氏封建堡垒，更具体地看到孔子的“仁”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孔子谈“仁”，提出所谓“仁政”、“德治”。但他所谓“仁政”、“德治”，只施于反动统治阶级，而对被统治的劳动人民，他要进行镇压。“孔府”这个所谓“圣人之家”，就是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统治、血腥镇压的一个缩影。过

去，在“孔府”的公堂上摆着一种特殊的刑具，是用最硬的木头，仿照甘蔗的形状做成的，叫做“甘蔗棍”。不知有多少劳动人民，就在这“甘蔗棍”下，筋骨断，皮肉绽，以至含冤死去。“孔府”这座阴森森的阎王殿，在“仁政”的招牌下，每年都吞吃无数劳动人民。光绪三十二年，曲阜县林前村张凤亮、宋阳友二人，为冻饿所迫，到“孔林”拣了点干树枝，被“衍圣公”孔令贻亲自指挥爪牙毒打，又给带上八十斤重的枷，打进阴暗的牢房内。时间一长，身上的棍伤溃烂成疮。可是孔令贻这个活阎王，饭不给吃，觉不让睡，继续拷打，就这样，活活被打死。事实充分证明，孔子的“仁政”、“德治”，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鲜血淋漓的鬼头刀！

孔子谈“仁”，还提出所谓“富民”、“利民”。孔子高唱“富民”、“利民”，究竟是些什么货色？试看到了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一家七口，就霸占了百余万亩土地，地跨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安徽五省；仅在山东就有七屯、八厂、七十二皇庄，对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剥削方式包括收取地租、强迫农民纳贡和负役、额外加派和强制送礼、放高利贷等等，形式繁多，手段极为毒辣。仅以地租而言，最多时每天即进粮约五百石，年收租约十八万石。在“孔府”的重重盘剥下，广大农民一贫如洗。据曲阜县红庙村的调查，当时一百一十户，有九十多户给“孔府”当佃户，过着“破屋漏着天，破衣漏着皮，破锅漏着底”的悲惨生活。一九二七年遭灾，几乎颗粒未收，而“孔府”的十二万斤租粮，却少一颗也要治罪，害得九十户佃农中有八十五户逃荒要饭，死了一百一十多口，其中有十二户全家死绝。一户户农民的血泪史，有力地说明孔子及其后代，干着敲骨吸髓的吃人勾当，戳穿了孔子“富民”、“利民”

的画皮。

孔子谈“仁”，还提出所谓“仁义道德”。这完全是骗人的。“孔府”极力标榜自己是“爱人”的，到处立碑筑坊，把自己装扮成“仁义”之府，“道德”之家。而实际上，一代代“衍圣公”们全是寡廉鲜耻、男盗女娼的家伙。一代一代的“衍圣公”们，在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建造的宫殿里，整日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据“孔府”档案记载：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孔府”的佃户村西岩庄，由于灾荒，饿死三十余人，逃难八十余户。可就在这时，“孔府”喂鸟用鸡蛋，喂狗用猪肝，喂猫用鱼，更大宴杀人刽子手蒋介石。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还有一首《忍颂歌》，胡说什么“善人自有天照看，害也徒然，告也徒然。”从孔子的“仁”到孔令贻的《忍颂歌》，全是打着“爱人”的旗号，实则是毒杀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

“孔府”的一部罪恶史，充分说明了孔子的“仁”的虚伪性和反动性，它有力地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反动统治阶级对被统治劳动人民，不是“爱人”，而是吃人！列宁说：“我们摒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列宁的话，道破了“仁”这种东西的反动本质。

孔子以他的“仁”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扮演了历史上最大的两面派的脚色。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妄图维护和复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也就很自然地继承了孔子的反革命两面派的衣钵。刘少奇在他的黑《修养》中，把孔子的“仁”改头换面，大肆宣扬什么“将心比心”、“委曲求全”等谬论。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当他一次又一次在敌人的法庭上，为了自己的一条狗命，出卖革命和同志的时候，他是将的什么“心”，

比的什么“心”？解放初期，他跑到天津，与资本家狼狈为奸，公开鼓励资本家：“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工人不听话，要斗争，这是合法的”。在这里，刘少奇又是将的什么“心”，比的什么“心”？很明显，他是以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之“心”，比他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之“心”。刘少奇也就是这样打着共产党的旗号，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阴险的两面派。他所以要大力兜售孔子“仁”的思想，就是为了挽救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灭亡的命运，抹杀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

我们从孔子的“仁”，看出孔子伪善和残忍的两面。孔子的“仁”，对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来说，决不是“爱人”，而是“吃人”。刘少奇兜售它，就是要欺骗人民，搞阶级调和，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我们要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孔子的思想核心的“仁”和刘少奇宣扬的反动理论，清除它们的恶劣影响，把它们通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原载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大众日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实质

复旦大学红卫兵 伍 坚 肖 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制造出来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信条。几千年来，它被地主资产阶级奉为不可触犯的“圣道”，作为向劳动人民实行反动统治的精神武器。大叛徒刘少奇完全继承了孔子的一套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特别卖力地兜售孔子的这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处世哲学，甚至把它吹捧成所谓“党性修养”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他在黑《修养》中，抽掉阶级性，要共产党员“能爱人，能恶人”，对人家要能够“忠恕”、“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体贴人家，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鼓吹要“以德报怨”、“毫无报复之心”，等等，妄图用这一套来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向国内外阶级敌人投降，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准备。

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都告诉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头至尾都是一场大骗局！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个光辉的论断深刻地阐明了：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人与人的关系是阶级关系。对于反动阶级，你不斗它，它要斗你；你不消灭它，它要消灭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定律。

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绝对不存在什么相互的“以德报怨”，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关系。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他鼓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一套东西，不过是为了维护日趋崩溃的奴隶制度而发出的悲鸣和嚎叫。孔子炮制这种反动理论，就是要深受压迫和剥削的奴隶阶级不要对奴隶主阶级进行反抗和斗争，而只能“宽容”、“忠恕”、“以德报怨”，忍受压迫，甘心当奴隶。这种奴隶主式的说教，就是统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更阴险的是，孔子还把它涂上一层“全民”的色彩，使它更带有欺骗性。其实，一切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从来没有实行过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否则，他们的剥削就要停止，他们的压迫就不能继续，他们的反动统治就要立刻完蛋。人民公敌蒋介石在高唱“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同时，不是大肆叫嚣：“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吗？他疯狂屠杀革命人民，使数百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人头落地。正如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这是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动谬论的有力批判。

孔子的这种“忠恕”之道，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为维护剥削制度服务的，它适应一切反动阶级的需要。历代封建帝王，都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夫子之道”称作“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的“治国法宝”。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抬出孔子这具政治僵尸，卖力地鼓吹这种“阶级调和论”，毫不足怪。刘少奇要用孔子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反动理论来为他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刘少奇却高喊要“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要革命人民放下武器，取消斗争，走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的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但刘少奇却胡说，“中国人民的民族性就喜欢宽大”，叫嚷对阶级敌人要“容忍”，要“以德报怨”，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体贴人家”，好让牛鬼蛇神在“忠恕”口号的掩护下，苟延残喘，积蓄力量，以便东山再起，复辟资本主义。总而言之，刘少奇的这套反动理论，在剥削阶级掌权的时候，是欺骗人民，麻痹革命人民斗争意志，取消暴力革命的麻醉剂；在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后，就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迷魂汤。按照刘少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理论去做，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事实面前，在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阴谋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严重事实面前，就可能掉以轻心，丧失警惕，放弃任何斗争；按照这样的反动理论去做，我们就要亡党亡国，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

大叛徒刘少奇鼓吹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思想，是打着所谓“党性修养”的旗号来进行的，有着很大的迷惑性和危害性。它妄图使一些党员蜕变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大叛徒刘少奇还鼓吹孔子的“忠恕”之道，妄想使党的生活变成一潭死水，使党组织和党员变得死气沉沉，从而在政治上腐化起来，逐渐蜕化变质。十分清楚，这正是刘少奇推

行“和平演变”的一把软刀子，是他阴谋篡党篡政的反革命野心的大暴露。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就是对刘少奇所鼓吹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阶级调和论的最深刻最严厉的批判。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就是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孔子的一套“忠恕”之道，并不能挽救奴隶制度的灭亡。难怪乎孔子要悲叹“吾道穷矣”。同样，刘少奇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一套，也不能挽救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彻底垮台的命运。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不管刘少奇怎样妄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无产阶级革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文汇报》）

批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谬论

驻上海师范学院工宣队十二连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孔老二为剥削阶级出谋划策的一个极其反动的谬论。几千年来，它成为一切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维护统治和进行复辟活动的反革命信条。

有了这个“民可使由之”，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将奴隶当作工具和牲畜一样使用和使唤；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把农民终年束缚在土地上当牛作马，榨取他们的血汗；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无限制地延长劳动时间，使工人为他们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卖命。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利害关系是水火不相容的。剥削阶级要任意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就“不可使知之”。否则，被剥削阶级一旦觉悟，知道了什么叫阶级，什么叫剥削，就会起来革命，就会造剥削阶级的反。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生涯中，也奉行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反革命信条。他极端害怕群众，疯狂镇压群众，千方百计蒙蔽群众，要群众俯首帖耳地做他的“驯服工具”。他胡说什么：“群众象野马一样，发动起来就会出乱子”，他还大肆污蔑我们工人阶级是“破椅子”，“不能依靠”。也就是他，狗胆包天，竭力封锁伟大领袖

毛主席的声音，不让我们听到毛主席的指示，反对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害怕我们掌握毛泽东思想；同时，他极力叫嚣对群众运动要“控制得住”，宣扬“作驯服的工具”，“不论对与不对都要服从”，甚至如果中国党内发生了赫鲁晓夫政变，也要“服从”。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最彻底的群众路线。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是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把最广大的群众都发动起来，才取得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有最广大群众参加的伟大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率下，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学说的光辉照耀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革命群众，经过反复的斗争取得的。也正是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刘少奇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了产。

我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毛主席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下，进驻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领导那里的斗、批、改。为什么我们这些捏榔头柄的普通工人，对占领和改造这些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充满了信心和决心？这是因为我们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懂得不打好这个硬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不能巩固，革命的政权就保不牢。我们懂得自己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就千难万难难不倒，决心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把上层建筑占领下来，改造

过来。进驻之后,为什么我们能在短短几个月中,使学校的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因为我们把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交给广大革命师生,依靠学校中积极分子,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这就充分说明,我们做任何工作,不仅要放手让群众去做,而且要使群众明确工作的意义,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这样才能使工作做好。

(原载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

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谬论

巩 旭 黎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劳动创造一切。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劳动人民是世界的主人，是历史的主人，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旧社会里，历史却被颠倒，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身受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当牛做马，这完全是万恶的剥削制度所造成的。但是反动派为了永远维持他们的剥削利益，便编出了种种“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谬论，妄想使劳动人民不起来造反动派的反，世世代代做牛马。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孔孟之道”所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样的反动货色，它完全抹杀了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关系，而把它说成是一部分“劳心者”和另一部分“劳力者”的超阶级关系，似乎剥削阶级之所以能够压榨劳动人民，作威作福，是因为“劳”了“心”；而劳动人民之所以受苦受难，受剥削者迫害，是由于没有“劳心”的缘故。用“劳心”与不“劳心”的谎言掩盖激烈的阶级矛盾。这样一来，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就被宣布为“合理”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舆论。在旧社

会，那些自称为“劳心者”的是一伙什么人？他们根本就不“劳”什么“心”，他们是一伙吃劳动人民肉，喝劳动人民血的吸血鬼、寄生虫。他们是黑心、黑肺、黑肚肠。根本都是不劳力、不劳心的家伙。要说反动统治阶级有什么“劳心”的话，那就是“劳”最大限度剥削人民的“心”，“劳”最大限度压迫人民的“心”，以便敲骨吸髓地剥削劳动人民，更残忍地镇压劳动人民。

剥削阶级出于反革命目的，还颠倒黑白，拚命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什么“天下之通义”，把它说成是天经地义的事，用以麻痹人民。这那里是什么“天下之通义”，这是剥削阶级的“天下之通义”，是十足地“剥削有理”的强盗逻辑。毛主席教导我们：“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工农兵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就是要把“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这个旧案彻底翻过来，由工农当家作主，坚决镇压一切反动剥削阶级，对他们实行全面无产阶级专政！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谬论，既暴露了一切剥削阶级蔑视劳动、寄生成性的丑恶本质，更重要的是为了掩盖旧社会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反动性，它起着维护、巩固剥削制度的反动作用。所以，二千多年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都竭力宣扬这套反动理论，其目的就在于以此作为奴役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精神枷锁。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忠实代理人，是“孔孟之道”的狂热兜售者，他极力贩卖“剥削有功论”，极力为资本家撑腰，鼓励他们去“管”（镇压）工人，要工人对资本家“服

从指挥”，还肆意贩卖“读书做官论”，所有这些，无一不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套黑货的翻版。刘少奇鼓吹“剥削有功”，就是妄图把中国拉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让资本家、地主重新“治”（压迫、剥削）我们工人、贫下中农，使我们广大劳动人民重吃二遍苦。刘少奇鼓吹“读书做官论”，就是妄图毒害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诱骗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脱离工农兵，脱离劳动，做一个高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做一个为剥削阶级效劳卖命的“劳心者”，成为刘贼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工具。借孔孟之尸，还资本主义之魂，其用心真是毒透毒透！

孔子死去已经二千多年了，尸骨早已成了灰土，刘少奇也被革命人民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但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流毒，尚未完全肃清。我们工人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一手握锄头，建设社会主义；一手挥笔头，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上层建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造革命舆论，把“劳心者治人”等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意识批深批透，把被推翻的“劳心者”（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批倒批臭，使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永世不得翻身！如果我们只握锄头，不挥笔头，孔家店的幽灵就会依然复活，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就会蔓延滋长，夺占无产阶级舆论阵地，大造反革命舆论，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如果我们只挥笔头，不握锄头，则会脱离劳动，脱离群众，最终会成为蔑视劳动的“孔孟之道”的俘虏，滑向修正主义的泥坑。“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们工人阶级必须握紧锄头，握紧笔头，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才能使那些被推翻的自以为“劳心”的剥

削阶级不能兴妖作怪，在一个早晨猛扑过来，进行反革命复辟；才能永保红色江山不变色！

对那些自以为“劳心”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我们是坚决打倒，彻底推翻。至于一些中了“劳心者治人”或“读书做官论”流毒的革命同志，则应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深入到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中去，用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改造自己，肃清流毒，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做一个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

“中庸之道”是反革命之道

上林四厂 陶友之

一切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总要念出歪经，编出邪道，制造反革命舆论，来欺骗人民，掩盖其对广大劳动人民、革命分子进行血腥镇压、残酷剥削的反动面目。孔孟之道，就是二千多年前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统治服务后又为一切剥削阶级所利用的反革命之道。

“中庸之道”是“孔孟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意思，它是奴隶主哲学的一条说教。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一面拿刀杀人，一面高唱“中庸”，装出“公正”的样子，打着“为民”的旗号，欺世盗名，大于其奴役、镇压人民的反革命勾当。

在阶级社会中，你不是站在革命阶级一边，就是站在反动阶级一边，不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就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决无不偏不倚的中间之路，“中庸之道”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反革命之道。

试看，从“中庸之道”的创始人孔子到他的徒子徒孙曾国藩、蒋该死、刘少奇，声嘶力竭鼓吹“中庸之道”，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架势，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剥削

阶级的最大的偏者和倚者，他们对奴隶主、地主、资本家大讲“仁爱”，对我们劳动人民，非但不讲，而是磨刀霍霍，进行镇压和迫害，吸劳动人民的血，吃劳动人民的肉，大干反革命勾当，孔子是这样，曾国藩、蒋该死、刘少奇之流无一不是这样，他们都是大耍“中庸之道”的反革命两面派。

我厂的一个反动资本家也是这样。解放前，他见人总说：“我开厂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大家有饭吃。你们好好干，把厂搞点好，厂里赚了钱，大家有好处。”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明明是我们工人养活了这个寄生虫，他却颠倒黑白，胡说他“为了大家”，在“为了大家”的幌子下，逼着我们工人做死做活，从鸡叫做到狗叫，为他卖命，结果仍是穿不暖，吃不饱，把工人的血汗统统装进他的腰包。他一家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花园洋房。什么是“为了大家”，是为了他一家。厂里有一个老工人被繁重的劳动折磨而死，工人们要他拿出一点丧葬费，狠心的血老板就是一毛不拔，后来还是工人弟兄们自己凑了钱，才埋葬了这个老工人。看，资本家是多么狰狞凶残，这是“为了大家”、“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的血淋淋反动本质的大暴露！

一切剥削阶级和它的代理人，都以他们自己的反革命行动，揭穿了“中庸之道”的反革命实质。他们鼓吹“中庸之道”，从来不是自己对人民要实行一点什么“中庸”，目的是要把这个抹煞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矛盾的毒汁注入人民的头脑，要人民对他们实行“中庸”：对他们的反动统治不要揭露，对他们的血腥镇压不要反抗，对他们的残酷剥削不要斗争。任意受他们剥削、奴役、压迫。一句话，就是对反动派不要起来造反。这是什么“中庸之道”？是阶级调和之道，是为一切反动统治服

务的反革命之道。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个“中庸之道”的狂热兜售者，他不仅利用大小黑会竭力散布，而且还写进黑《修养》，把它全盘继承固定下来。大肆宣扬要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做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哥哥”，“好朋友”，……。一句话就是要人们做一个“老好人”。怎样“好”法呢？用刘贼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有“将心比心”的心肠，要“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体贴人家”。在这里阶级立场、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统统被他一笔勾销了，所有的只是资产阶级的人情、人性和仁爱了。刘贼所说的“人家”，不是别的，只能是指的一切剥削阶级。他所说的“体贴”、“着想”，就是要我们“体贴”美帝、苏修等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国内外反动势力“着想”，对资产阶级不要“过火”，对他们施“仁政”，当他们的“好朋友”，不要反抗、不要斗争，不要消灭他们。刘贼所兜售的“老好人”，不是什么新货，是贴上刘记标签的“中庸之道”，就是不许造反动派的反。

历来一切反革命头目，为什么要拚命地贩卖这个黑货？这是因为他们懂得光靠拿刀杀人这硬一手，没有用软刀杀人的另一手，他们是难以维持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软刀子杀人比硬刀子杀人更恶毒。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大肆宣扬“中庸之道”和“好人主义”，而且还往往披上“老好人”的外衣混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兴妖作怪，这就必须引起我们百倍的警惕。

在我们革命队伍中，那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同志，正是中了这种“孔”、“刘”之毒的反映。中了这种流毒之后，就成为一种是非分不清，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的人。对敌人不敢进行狠狠

斗争，对修正主义那套黑货不敢进行彻底批判，对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不敢挺身而出，进行批评、斗争。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磨灭了革命的斗志，这些人非但不感到这是大问题，反以为是搞好关系的诀窍：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大事化小小化了，人人说我好。对这些同志，我们必须大喝一声：同志！应该清醒，刘贼所鼓吹的“好人主义”是白糖裹着的砒霜，吃不得！吃了以后，必定是害己害革命。你不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好，实际上就说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好；你不说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坏，实际上就说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坏。不是有利于无产阶级，就是有利于资产阶级，两者必居其一。社会上的一切言行，都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反映，决不能不说好，不说坏，而应该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老好人”的思想根源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私字，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是封建主义“中庸之道”的翻版。“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好人主义”在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对于有这种思想和行为的人，我们要帮助他们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使他们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什么是无产阶级应有的坚定立场，什么是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从而来一个思想上的飞跃，与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起，共同把孔子的“中庸之道”和刘贼的“好人主义”批透、批臭；把披着“老好人”外衣，宣扬“中庸之道”，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揪出来，斗倒、斗臭，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人民电机厂工人写作组

两千多年前，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孔老二曾经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么一句黑话。两千多年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出于其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把这句黑话拣了过来，变换了一下形式，成为“要起作用，必须有相当的地位”，把它塞进“入党做官论”中。

孔子所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做这个官，不管这个事。他为什么要讲这种话？这既是他在做官不成、四处碰壁时的一种牢骚，同时又反映了他竭力维护没落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一种反动思想。孔子为了削尖脑袋钻进奴隶主政权中去当大官，曾跑到七十几个奴隶主诸侯国去说教献媚。但是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他不仅没有捞到什么大的官职，而且碰壁出丑，甚至被驱逐出境。于是，孔子摆起臭架子来了，说什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孔老二真的不管奴隶制国家的政事了吗？不是的，就是在碰壁之后，他仍然在为培养奴隶主阶级的接班人用尽心血，还不断地发表为巩固奴隶制国家效劳的反动政治见解。包括这个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内，它所宣扬的就是“各安本份”，被剥削、受压迫的奴隶不能起来造反，剥削阶级内部君、臣、诸侯、大夫

也不能互相越位，拚死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主的反动统治。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在他的“入党做官论”中，讲什么“要起作用，必须有相当的地位”。明白一点说，就是宣扬要“起作用”，必须做官。这是他要党员借“起作用”为幌子，向党向人民要名利，要地位，要“官”做。刘少奇用这套极其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去毒害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灵魂，为的是使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蜕变成只能当“官”，不能为民，只能上，不能下，高踞于广大劳动群众之上的特权阶层，演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虽然把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粉碎了。广大的党员经过群众斗争革命暴风雨的锻炼，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有极少数同志，在由“官”为民之后，却唱起了“无官一身轻”的调子。他们或则埋头劳动，百事不管；或则象算盘珠子一样，你拨一拨，他动一动。他们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战士作用，却还说什么：“我是‘老百姓’，又不是什么干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的这种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建立在高度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的基础上的。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把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当作自己崇高的革命理想；并且在实际斗争中，在不同的战斗岗位上，始终朝气蓬勃地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为实现这个崇高理想而努力奋斗，自觉地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我们应该遵循毛主席关于“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的教导，不仅要坚决抵制、彻底批判把入

党作为做“官”的手段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且也要坚决批判、彻底克服那种认为“无官一身轻”的极其错误的思想。因为这两种思想都不是把当不当干部或者工作岗位的变换，看作是革命斗争的需要，革命分工的不同，当干部不当干部都自觉地发挥先锋战士的作用；而是把“党员的作用”和“做官”划上了等号，做“官”了就运用其地位，大摆“官”架子，不做“官”就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实际上还是孔老二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反动思想在作怪，还是刘少奇的“要起作用，必须有相当的地位”这个谬论的余毒没有肃清。我们厂有一位党员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由车间主任提拔为副厂长，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以后在车间劳动。由于没有正确地吸取教训，他反认为：“现在头上没有乌纱帽，搞好生产就算好，下班准时走，上班准时到，不当权，什么我也管不了”。后来，他参加了厂里的整党建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伟大建党纲领，用“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八个大字检查自己，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要革命，不论“当权”还是“不当权”，都要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以后，他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勇敢地站到“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一线，积极地发挥一个党员应起的作用。

我们希望那些直到现在仍抱有“无官一身轻”错误思想的同志，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狠触自己的灵魂，狠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迅速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赶上飞速发展的大好革命形势。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七日《解放日报》）

驳“善为战，大罪也”

上海警备区某部 张贤伯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可是，一切剥削阶级却抹煞战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区别，而鼓吹什么“人类之爱”等超阶级的东西，反对革命战争和掩盖其发动反革命战争的罪恶。孔孟之道中的“善为战，大罪也”，就是抽掉了战争的阶级性，反对革命战争的一个谬论！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出于其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从没落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武库里拣来这一破烂货，竭力推行“三降一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他一方面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人民放下枪杆子，同本国的反动派搞“合作”；另一方面又把帝国主义国家说成是“也有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不会发动侵略战争，竭力麻痹革命人民的革命警惕性。这些鬼话，充分暴露了刘少奇是一条帝、修、反的忠实走狗。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求得解放，必须拿起枪杆子，彻底推翻帝国主义

及其走狗在本国的反动统治，决不能同反动派去搞什么“合作”，走什么“议会道路”。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南征北战，打垮了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围剿”，打败了日本法西斯强盗，最后把美国强盗赶出中国，推翻了蒋家王朝，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如果不用正义的战争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不用革命的枪杆子去粉碎反革命的枪杆子，那就没有我们国家的今天，就没有我们党的今天，就没有我们军队的今天。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教训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一切现代修正主义者妄图用什么“和平过渡”的谬论来扑灭各国革命人民的斗争烈火，是怎么也办不到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由它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它们不仅要残酷剥削和压榨本国人民，而且还必然要向外进行扩张，掠夺市场和原料产地，以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发动侵略战争，这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产物。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就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它们决不肯放下屠刀，也决不能成佛，绝没有什么“头脑比较清醒”的不想发动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头子。

当前，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加紧互相勾结，阴谋策划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这正戳穿了叛徒刘少奇的无耻谰言。面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准备，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教导，做好充分的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出发，用这个观点

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发扬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一旦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就用革命战争把它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七日《解放日报》)

决不听信一切帝国主义的“好话”

——戳穿孔子“君子戒斗”的澜言

驻沪空军 卫红鹰

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孔老二，曾经鼓吹过一种谬论：“君子有三戒”，其中之一是“戒之在斗”，即所谓“君子戒斗”。他的意思无非说，“君子”也就是剥削阶级，是不和别人斗的。

吸吮劳动人民骨髓、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反动剥削阶级，真的是什么“戒斗”的“善人”吗？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翻开史册，那一页不是对“君子戒斗”论的无情揭露与莫大讽刺！几千年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千方百计保住自己头上的王冠，他们剥削、压迫劳动人民，不准人民起来造反，残酷地镇压奴隶和农民的起义，这难道就是“君子戒斗”吗？人民公敌蒋介石高喊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革命口号，屠杀革命人民和共产党人，这难道就是“君子戒斗”吗？日本帝国主义野蛮进攻中国，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这难道就是“君子戒斗”吗？美帝国主义远涉重洋，侵略越南；社会帝国主义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再挑起中苏边境事件……。这些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和阶级斗争现实，猛打着孔老二的耳光，宣告了“君子戒斗”澜言的破产！

反动统治阶级的反革命本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它们的“斗”就是剥削，就是压迫，就是侵略，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谓“君子戒斗”，“戒”是假，“斗”才是真。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其实，剥削阶级不仅要同被剥削阶级斗，而且在剥削阶级内部，它们之间狗咬狗的“斗”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显然，把反动统治阶级的“必斗”，说成是“君子戒斗”，这完全是一大骗局，是剥削阶级用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遮羞布！

正因为如此，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总是把孔老二的“君子戒斗”论奉为法宝，把它稍加装饰、改头换面，到处挥舞。封建地主阶级的“积善”、“仁义”，人民公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日本帝国主义的“王道乐土”，美帝国主义的“和平”、“博爱”，社会帝国主义的“人道”、“友谊”，等等，一副副伪善的面孔，一套套堂皇的词句，无一不属这一类。伟大导师列宁曾经明确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孔老二之流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牧师”鼓吹“君子戒斗”，就是要人们相信狼“不吃人”，反动统治阶级“不压迫”，帝国主义“不侵略”。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劳动人民听凭剥削阶级剥削、压迫、奴役和侵略。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也捡起“君子戒斗”这个破烂，喋喋不休地叫嚷什么：“奴隶主讲的道理最好……它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逐渐认识到，战争政策未必对于帝国主义有

利。”这个大叛徒把古今中外的剥削阶级美化到何等地步！在刘少奇的眼睛里，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居然成了“和平天使”，真是无耻之尤！

当前，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正在大耍反革命两手，它们一手积极扩军备战，准备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一手却又在大放“和平”烟幕，妄图遮住世界人民的耳目，从而实现其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罪恶野心。这是一切反动阶级惯用的伎俩。对此，我们必须百倍提高革命警惕。我们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充分认清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做好一切准备。如果帝、修、反胆敢把战争强加到我们的头上，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原载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最勇敢

——批臭孟子“死伤勇”的谬论

驻沪空军 冲霄汉

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孟子，曾经大肆鼓吹“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这一谬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可以死，也可以不死，死就失掉了勇敢。他玩弄诡辩术，故意抽去了为谁而死、为什么而不死这个实质性的问题，把“死”和“勇敢”截然对立起来，这既是以“死”来吓唬、阻挡劳动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同时也暴露了他们自己贪生怕死的丑恶灵魂。

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不同的阶级历来就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革命最彻底，斗争最勇敢，也最富有牺牲精神。生为革命的利益而生，死为革命的利益而死，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生死观。而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代表了没落、腐朽的势力，他们生为“我”，死也为“我”，奉行“好死不如赖活”的活命哲学。“为革命，宁可前进一步死，不愿后退半步生”，这是无产阶级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为个人，战栗怕死，屈膝求生”，这是最卑鄙、最可耻的叛徒嘴脸。历史上的反动家伙都是贪生怕死的。孟子说什么

“死伤勇”；跳梁小丑苏联的赫鲁晓夫说什么“脑袋也保不住，还讲什么原则”；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说什么革命“有可能把自己的脑袋革掉”，“我们要保护脑袋”。看！这些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一唱一和，如出一辙！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卫道士孔老二，为了自己不死，戒吃街上卖的酒肉；罪恶滔天的美帝头子尼克松，为了自己活命，在玻璃罩里发表“就职演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了保护自己的脑袋，多次背叛革命，出卖同志，从敌人狗洞里爬进爬出。这些剥削阶级代表的贪生怕死的表演，真是丑死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和阶级弟兄的安全，可以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天不怕，地不怕，苦不怕，死不怕，这是无产阶级特有的阶级本色。革命者有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就能上刀山，下火海，不畏强暴，不怕艰险。有了这种精神，黄继光就能挺出胸膛堵枪眼；董存瑞就能手托炸药爆碉堡；邱少云就能烈火满身不动颤；罗盛教就能冒着冰冻救儿童；刘胡兰就能横眉冷对敌铡刀；……

林副主席指出：“只有用刺刀杀出威风来的部队，才是最勇敢的部队……部队勇敢的标志是刺刀见红”。“勇敢性：进攻敌人时不怕伤亡，前仆后继。进攻就是前仆后继，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跟着上，不因敌人炮火猛烈而停止。”没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见到敌人的刺刀就手发抖，听到枪响就往后跑，这

样，刺刀怎么能见红，怎么能战胜敌人，消灭敌人？只有有了不怕死的精神，才能杀出刺刀见红的威风，才有最大的勇敢，最大的战斗力。所以说：勇敢的精神就是不怕死的精神；为革命和人民而死，就是最大的勇敢。从孔子、孟子到刘少奇，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贩卖“死伤勇”之类的活命哲学，妄图以此来腐蚀、麻醉劳动人民的斗志，吓唬、阻挡劳动人民起来革命。但是，在英勇的革命人民铁拳的打击下，这样的幻梦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历史早就宣告了他们的阴谋的破产！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什么是最大的战斗力？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勇敢，不怕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过去，我们靠它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摧毁了蒋家王朝；今天，我们靠它和帝、修、反作斗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将来，我们还要靠它在整个地球上把帝、修、反彻底埋葬，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原载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孔孟的“忠、孝、节、义”是啥货色？

松江县泗联公社九星大队贫农 王宝宝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孔孟之道中的“忠、孝、节、义”，是奴隶主、地主头子用来欺骗人民、压榨人民的鬼把戏。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拚命说“忠、孝、节、义”好，真把我侬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了！“忠、孝、节、义”是四根绳，剥削阶级专门用它来捆我侬劳动人民；“忠、孝、节、义”是四把刀，剥削阶级用它杀害的劳动人民，勿晓得有多少！我老家在浙江硖石，三十九年前，我七岁辰光，害了一场大病还没完全好，爷娘看看屋里老老小小一堆，破米缸底朝天，烟囱几天不冒烟，一家人眼看要饿死，把我卖给地主当丫头。在吃人的旧社会，我前后被转卖三次，受尽地主、资本家的压迫，我的半辈子生活，使我晓得孔孟的“忠、孝、节、义”是啥个货色！

我被卖到姓夏的恶霸地主家当丫头时，这个恶霸地主对我说：“侬要好好做生活，我叫侬做啥就做啥，有侬的好处！”这句话的意思，不就是要我对他“忠”吗？“忠”是有阶级性的！有“忠”于无产阶级的，有“忠”于剥削阶级的，地主抹杀“忠”的阶级性，是为了阻止我侬农民起来反抗，维护其反动统治。这个

恶霸地主家有一千多亩田。我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起早摸黑，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一床破被头，盖了上头没下头，想想眼泪往肚子里流。到十九岁，我结婚了，后来有了孩子。但我产后没几天，地主就硬逼着我下地拔棉花萁，我头昏眼花，那能拔得动？人差点昏倒在田里。我爱人、阿公、阿婆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一家人拚死拚活，替我把那块田里的棉花萁拔光。代表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利益的孔孟的“忠”，对剥削阶级有一百样、一千样好处，对我佃贫下中农，没半点好处，只有害处。对剥削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我们就是要造它的反，同它斗争到底！

提起“孝”，真叫我火冒！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姓侯的资本家的孝子贤孙，对我的残酷迫害。我被一家地主转卖到一个姓侯的资本家当丫头后，将近三个月，这个姓侯的老吸血鬼得病死了。这个老吸血鬼的孝子贤孙，拉来一大帮道士，大搞迷信活动。更使人气愤的是，这些孝子贤孙看我属虎，就硬说我是“白虎星”，“克”了这个老吸血鬼的命。侯家孝女对着老吸血鬼的尸体一边哭，一边骂我：“亲爷，侬全是被这个‘白虎星’害煞的呀！”他们逼着我披麻戴孝，跪在老吸血鬼面前哭。我佃贫下中农恨死地主、资本家，怎么哭得出来！这个老吸血鬼出丧后，侯家的孝子将我一把头发揪牢朝墙上撞，撞得我头破血流，还把我禁闭在放老吸血鬼棺材的“灵堂”里，关了三天三夜，打得我全身是伤。后来他们又出鬼主意，以八十四元的代价，将我卖给姓夏的地主。这样一转卖，他们从我身上又捞进四元钱。那年，我才八岁。到了十几岁，我越想越气，姓侯的老吸血鬼的老婆，也是属虎的，那能就不讲她是“白虎星”？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为了替他们的主子尽孝，就是这样千方

百计从我侬贫下中农的头上开刀。孔孟的“孝”，充满我侬贫下中农的血和泪！

至于孔孟之道中的“节”和“义”，也是和“忠”、“孝”一样，乌天黑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乡下大地主跟日本鬼子勾勾搭搭，当汉奸，连中国人的一点起码的骨气都没有，有啥个“节”？解放前我侬乡下有不少地主在死后立起什么“节孝牌坊”，这些地主在活着的时候，有那一个不是吸血鬼，有那一个不是男盗女娼？死后却来个“吊死鬼搽粉——死要脸”。地主、资本家对我侬劳动人民那里有啥个“义”？在万恶的旧社会，我给地主、资本家当了几十年牛马，经常遭他们毒打，至今我身上还有五个伤疤，这就是他们对我的“义”！这些人绝不会对我侬劳动人民讲“义”，他们有的是狼心狗肺。剥削阶级妄图用“节”和“义”这种鸦片烟来欺骗我们，幻想要我侬对他们讲“节”和“义”，我侬决不上当。我侬要发扬革命的节气和无产阶级的感情，为着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头可断，血可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孔孟之道是反革命复辟之道。刘少奇为孔孟“忠、孝、节、义”大叫大嚷，就是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制造反革命舆论，要劳动人民吃二遍苦。我侬贫下中农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侬一定要彻底肃清“忠、孝、节、义”的流毒，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原载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

大批刘少奇宣扬的“孔孟之道” 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

——松江县部分干部、贫下中农批判孔子座谈会纪要

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是反孔派

金玉堂(县革命委员会):

《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第六期、第七期合刊上发表了《孔家店的幽灵与现实的阶级斗争》一文后,掀起了批判孔家店的热潮。

批判孔子,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任务之一。我们要把“打倒孔家店”的战斗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孔子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孔孟之道”是千百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用来统治、蒙骗、毒害、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历来的反动派都是尊孔派,历来的革命派都是反孔派。臭名昭著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反对革命,梦想恢复封建帝制,坐龙廷,做“皇帝”,演出过“朝圣”的丑剧;人民公敌蒋介石为了维护他的反动统治,提倡反革命的“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把孔子生日作为“国定”纪念日,还跑到曲阜去“朝圣”过。蒋匪帮至今还每年搞祭孔丑剧。那些穿西装革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着长袍马褂的封建遗老遗少,都在孔老二面前双膝下

跪，磕头礼拜，妄想复辟资本主义。满脑子浸透“孔孟之道”的大叛徒刘少奇，在黑《修养》中大喊大叫，竟要人们学习所谓“我国历代圣贤的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竭力宣扬孔孟的“修身养性”之道，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制造反革命舆论。刘少奇步人民公敌蒋该死的后尘，解放以后，鼓动一些牛鬼蛇神又重演了曲阜“朝圣”的丑剧，无耻宣扬“孔夫子是圣人”。一九六二年，在他“充分利用孔子”的黑指示下，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刮起了一股“尊孔”的黑风。“三家村”黑干将廖沫沙之流公开叫嚷孔老二是他们的“先师”。周谷城更公然跳出来为旧礼教大造反革命舆论，抛出了《礼乐新解》的大毒草，大吹大擂孔子的反动思想体系。刘少奇还通过他在文化教育部门的代理人，把孔家店的黑货在报刊、课堂、学术会议、中小学教材，甚至连环画中大肆贩卖，毒害我们的革命后代。早已为中国人民唾弃了的叛徒、汉奸、特务王明，不久前还在如丧考妣地痛悼孔家店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所摧毁，狂吠我们触犯了孔子这个“堂堂夫子”，拚死为孔老二招魂。可见，历来的反动阶级，在利用孔家店迫害人民这一点上，都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无一不是拜倒在孔子的脚下。他们搞“尊孔”，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更加残酷的剥削人民、压迫人民、奴役人民。

要把批判孔子的斗争不断引向深入，达到家喻户晓，必须广泛地发动群众。广大工农兵是革命大批判的主人，他们最有发言权，最有战斗力。只有千百万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奋起投入这场批孔战斗，“孔孟之道”这个反动的思想体系，才能受到彻底的批判。

批判孔子，一定要与我们农村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农

村的“四旧”，追其根源，没有一样不和孔子联系着的。破“四旧”，就要批孔子。只有批判孔子，才能更好地破“四旧”。我们要把孔子的徒子徒孙以及刘少奇在黑《修养》中所宣扬的“孔孟之道”，彻底批倒，连根铲除！

批“孔孟之道”要与破“四旧”结合起来

驳“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胡秀春(城西公社联星大队革委会)：

孔子是唯心主义的吹鼓手。他宣扬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谬论，就是要我们相信“时辰八字”、“命相”的鬼话，就是说一切剥削阶级不劳动，“穿绸着缎住高楼，鸡鸭鱼肉天天有”，是因为他们“命相”好；我们贫下中农“年初做到年夜头，落得两个空拳头”，“糠糠菜菜半年粮，红花野草填肚肠”，是因为我们贫下中农“命相”不好。照孔子这种反动论调，剥削阶级压迫我们劳动人民是天经地义，我们贫下中农受压迫、受剥削是理所当然。多少年来，所谓“时辰八字”、“命相”、“运气”、“命苦”、“倒霉”、“晦气”、“额角头”之类的“宿命论”，欺骗、毒害了我们人民群众。现在，我们贫下中农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命运不掌在天，死生不在于命。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

都贯气了！”毛主席的话，大长了我们贫下中农志气。我们大队有个富农分子，是高利贷剥削者。他在解放前，大斗进，小斗出，利滚利，息上息。有一年放债二百石米，年底本息成了三百石大米。他用这种高利贷剥削，越来越富。这家伙为了遮人耳目，迷惑群众，拚命宣扬什么自己“命”好，得了“长生运”，“天仙”相助；咒骂穷人“前世不修命里穷”。果真是这样吗？现在我们专了他的政，他“长生运”忽然没有了，“天仙”也不相助了。可见穷富不在于命，不在于天，不在于神，而在于“权”在谁手里。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站起来革了地、富、反、坏、右的命，打倒了他们，掌握了政权，我们就获得了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翻身解放。

“宿命论”是道道地地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要批判“宿命论”。“宿命论”不破，革命精神就振作不起来。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什么“时辰八字”、“命相”、“风水”，都是骗人的鬼话，统统要把它们打倒。世界上根本没有神，也没有鬼。“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幸福日子的到来，靠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劳动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解放。

破封建宗族观念

李金生(城西公社革委会)：

大叛徒刘少奇在黑《修养》中大肆鼓吹孔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孟所宣扬的“齐家”，就是封建宗族观念，是剥削阶级搞阶级调和的一条绳索。封建宗法观念的残余，是我们革命的对象。在农村，地主阶级历来宣扬什么“我们同宗，同姓，五百年前同一家”的宗族思想，来掩盖阶级矛盾，以便他

们进行阶级剥削。我们公社有个姓吴的地主就是这样，他经常宣传“一笔写不出两个‘吴’字”。这种谬论，在解放前，就是不让贫下中农造他的反，革他的命。在今天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要我们贫下中农不与他作斗争，当作“长辈”供奉他、孝顺他。但是，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同是这个姓吴的地主，解放前对同姓的贫下中农却是进行残酷剥削的能手。有个长工吴仁云，十二岁就当了他的放牛娃，十六岁那年，吴仁云患痢疾，一天泻二十多次，双眼凹陷，面黄肌瘦，可是，这个姓吴的地主硬逼他攒稻，致使吴仁云昏倒在地。吴仁云拚死拚活做了十三年，到头来还倒欠地主六十石大米。

在阶级社会里，一切应按阶级来划分。凡姓吴的并不都是一家人。我们千万不能再上“宗族”的当，凡是贫下中农，不管姓张，姓李，姓赵，姓王，都是阶级兄弟，革命的同志；凡是剥削阶级，不管是同宗，同姓，同村，同宅，甚至同一个家庭，都要坚决斗争，划清界限。剥削阶级不是我们贫下中农的自己人，是我们的对头，是我们专政的对象！

薛明权(城北公社革委会):

农村中的“过房亲”也是封建宗法思想的残余，这种旧风俗不破除，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就不牢固。在阶级社会里，一切现象都要作阶级分析。我们公社有个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社员，就先后攀了九户“过房亲”。他认为攀了“过房亲”，不是亲也是亲，“臂膊总是朝里弯”，“别人讲闲话，可多一张嘴帮”。“过房亲”成了他搞自发资本主义的保护伞。有的人相互攀了“过房亲”，就是非不分，明明是错的，也不反对，不批评，不斗争，眼开眼闭。我们公社有些阶级敌人千方百计找贫下中农

攀“过房亲”。他们以为有了亲，可以帮他“多说一句好话”，逃避斗争。在阶级社会里，人和人的关系，是阶级的关系。只有贫下中农之间的阶级亲，才是真正的亲。谁中了攀“过房亲”的毒，就会只认亲亲眷眷，忘记革命政权，这实际上帮助了剥削阶级搞资本主义复辟。“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要把封建宗族观念彻底扫除干净。

反对早恋、早婚

薛明权(城北公社革委会)：

“早生贵子早得福”的谬论，是千百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陈腐观念，这是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反动婚姻观。在阶级社会里，一切社会现象，无一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早恋、早婚的现象，似乎是个人生活小事，但仔细分析，实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大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了伟大胜利，一切阶级敌人丧魂落魄，但他们还要垂死挣扎。其恶毒的手法之一，就是千方百计引诱青年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消磨革命意志，沉湎于谈情说爱，迷恋于“大胖儿子热炕头”的小家庭生活。有些青年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不能正确处理个人的婚姻问题。早恋、早婚的结果，学习和工作受到影响，革命意志衰退，严重地阻碍了进步。

大叛徒刘少奇胡说什么“对婚姻恋爱问题，一般是不干涉的，早婚……也不要干涉”的黑话。甚至叫喊要为青年开办“婚姻介绍所”，真是反动之极。在一九六二年前后，舞台上不是塞满大量宣传色情、早婚的戏剧吗？图书馆中不是摆满宣传“才子佳人”的图书吗？这是刘少奇一伙明目张胆毒害青年一

代的反革命罪行！

我们贫下中农对待婚姻问题的看法，与一切剥削阶级的陈腐观念截然相反，我们的幸福观应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联系起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种“早生贵子早得福”之类的反动婚姻观，是极其狭隘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在今天，早恋、早婚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动。“不要革命志气，只要个人享乐”的陈腐观念，与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格格不入。每个革命青年要关心国家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们贫下中农决不允许封、资、修的那套腐朽不堪的婚姻观，继续毒害我们的革命后代！

反对早婚，提倡晚婚，要做到家喻户晓，形成广泛的革命的社会舆论。

对剥削阶级决不能施仁政

周志青(县革命委员会负责人)：

刘少奇鼓吹“孔孟之道”的“忠恕”。“恕”，就是孔子所谓“仁”的翻版。在孔子的反动思想体系中，“仁”占着很大的比重。“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说“仁”就是“爱人”。

孔子宣扬的“仁”，是一种伪善。世界上那有什么“博爱”？那有什么超阶级的“爱”？地主阶级逼租逼债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是“爱人”吗？人民公敌蒋介石高叫“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革命口号，屠杀了成千上万的革命人民，这是“爱人”吗？黄世仁残酷剥削、迫害杨白劳、喜儿的罪行，这是“爱人”吗？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战场上用成千万

吨钢铁、化学武器屠杀越南人民，这是“爱人”吗？毛主席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超阶级的“仁”是没有的。

刘少奇大叫大嚷“孔孟之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就是鼓吹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讲仁。而历来的剥削阶级对我们劳动人民从来不施什么“仁政”的。城北公社有个姓洗的地主分子，在“积善堂”的匾额下逼死、冻死、饿死了贫农张寿根一家五人。佘山公社联华大队有个恶霸地主跑苏州、松江的衙门，象走娘家路，先后迫害了十八户贫下中农。

在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我们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决不能施仁政。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光辉著作中教导我们：“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一切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他们失败的。一九六二年，大叛徒刘少奇刮起了一股“尊孔”黑风，这是一股复辟妖风。一大批资产阶级学者、权威，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大谈孔子的“仁政”，实际上是反对我们搞无产阶级专政，不许我们镇压反革命分子，要我们对阶级敌人施仁政，让牛鬼蛇神兴风作浪，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这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这是革命的正道。我们要学习鲁迅先生主张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他说：“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从鲁迅先生主张痛打落水狗的启示中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总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对于一切反动派就是要批判，要斗争，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王伯顺(城北公社民乐大队革委会):

我们大队有个当过伪乡董(长)、族长的地主分子,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很“开明”、“仁慈”,把四个儿子的名字取为“仁、义、道、德”。而这个家伙,干的事件件男盗女娼。每年青黄不接,看到农民无粮,他便乘人之危,把自己装扮成一副“救世主”的面孔,把霉烂的籼米放高利贷给贫下中农。但到收获季节,他的“算盘一响,谷子进仓”,贫下中农的劳动成果被残酷地剥夺了去。

邱金因(城东公社联民大队革委会):

阶级敌人一遇风吹草动,总是要跳出来。我们大队有个富农分子,在一九六二年听到蒋匪帮妄想窜犯大陆的消息,就露出了反动阶级本性,到处张牙舞爪。有一天,他竟穿起了“派立司”长衫,杀气腾腾地说:“我要收租米了,你们干部当心点。”从这个反面教员的事实告诉我们,对敌对阶级,决不能施仁政。

破“读书做官论”

王国忠(泮港公社革委会教育革命小组):

大叛徒刘少奇竭力贩卖“学而优则仕”的“孔孟之道”,疯狂鼓吹“读书做官论”。说什么,青年“只要学好一门专长,将来就会成名成家,就有了一切”;“你们有文化,农民没有,比农民多一条;再加上一条跟群众关系搞得好的,具备三条就能当乡、县、省干部,也可以到中央,……”刘少奇这个大坏蛋心毒如蛇,妄图把我们贫下中农的革命后代演变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孔子鼓吹的“学而优则仕”，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读了书，成绩优异，可以做官。他这个“官”就是做贵族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读书做官论”是孔子反动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来的剥削阶级都以孔子的“学而优则仕”来培植反动文人，来毒害、麻醉劳动人民。他们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思想，是为了统治劳动人民，培养为他们服务的黑爪牙。

解放后，我们贫下中农不仅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而且读书识字，在文化上也翻了身。但是，我们学文化，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革命。我们读的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著作，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最正确、最科学、最完整的理论。掌握这个强大的理论，是为了更好地革命。我们也读自然科学的书，但那是为了搞社会主义建设，而决不是为了做“官”。剥削阶级宣扬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反动腐朽思想，是腐蚀人们灵魂的毒饵。

一切剥削阶级历来把文化看做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我们对阶级敌人专了政，可是，这些家伙叫嚷什么：“没收得了我的房屋、财产，没收不了我的文化。”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嚣张之极。他们抓住“孔孟之道”的残渣，死抱住“学而优则仕”想作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梯。什么“书包翻身，望子成龙”，什么“读书下本钵，书包里面赚大钱”，目的是要做骑在人民头上的“人上人”，这些谬论必须痛加批判！

潘金泉(佘山公社富林大队革委会)：

一切剥削阶级吹捧孔子是什么“圣人”。我们贫下中农最

痛恨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孔子。什么“学而优则仕”，全是颠倒黑白的胡话。我们要问：机器是谁发明创造的？土地是谁开垦的？粮食是谁种出来的？文化是谁创造的？世界是谁创造的？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工人阶级就是要领导一切，贫下中农就是要管理学校，对知识分子就是要进行“再教育”。

我们贫下中农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可靠的接班人。我们批判的是“学而优则仕”。对于革命的文化，我们是需要的。农村要大大发展电气、水利、化学、机械，要贯彻“农业八字宪法”，那一样不要文化？那一样不要科学知识？毛主席说：“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贫下中农就是要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型农民，普通劳动者；就是要培养我们贫下中农自己的“赤脚医生”、“赤脚教师”、“土技术员”、“土记者”、拖拉机手、会计。他们是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能文能武，能上能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接班人；决不是什么“仕”或什么“官”。

广大知识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号召，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他们树立了“上山下乡干革命，插队落户炼红心；永远忠于毛主席，海枯石烂志不移”的雄心壮志，他们的实际行动，就是对“孔孟之道”的最有力的批判，使那些竭力鼓吹“孔孟之道”的刘少奇和一切剥削阶级要夺我们革命接班人的希望化为泡影。

开展革命大批判，是“打倒孔家店”的最好武器。我们要把刘少奇所喋喋不休地叫嚷的“孔孟之道”的“修养”经，什么“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吾日三省吾身”等等批深批透，肃清其余毒。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文汇报》）

揭穿“礼尚往来”的反动实质

青浦县 青红哨

“礼尚往来”，是孔家店里的又一件黑货，流毒很深。在农村中，每当逢年过节，婚丧喜庆，一小撮阶级敌人往往就利用这个黑货向贫下中农进攻，大肆宣扬“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封建“人情”，拚命鼓吹送礼请客的旧风俗，说什么“圆团来，塌饼去，人在人情在”“有来总有往，亲眷不冷场”。他们妄图使贫下中农在“礼尚往来”中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从思想上解除武装，同阶级敌人“合二而一”。我们必须批臭孔老二的旧礼教，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礼”，同样是有阶级性的。在一切剥削制度下，“礼”是反动统治者对劳动人民残酷剥削的手段，是维护剥削阶级旧法统、旧秩序的工具。伟大的文化革命先驱者鲁迅，曾经用两个字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旧礼教的本质：吃人。解放以前，广大贫下中农吃足了这种“礼”的苦头。逢年过节，要给地主送“礼”；地主做红白喜事，要送“礼”；向地主租田、借债，要送“礼”；收获季节，又要给地主送尝鲜“礼”，……数不清的“礼”，受不完的苦；每一份“礼”，都渗透了贫下中农的斑斑血泪！不是讲“礼尚往

来”吗？解放前地主阶级有没有向贫下中农送过什么“礼”呢？没有，半点也没有！地主给予贫下中农的只有饥饿和皮鞭。可见在阶级社会中，“礼”就是具有这样鲜明的阶级性。

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了挽救自己覆灭的命运，就祭起孔家店“礼尚往来”的破旗，散播什么“礼尚往来，人之常情”之类的谰言，宣扬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叫我们忘记阶级，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而去对他们讲“人情”，施仁政。这是一个十分毒辣的阴谋。如果我们不是提高革命警惕，站稳阶级立场，而是“见礼三分亲”，同阶级敌人“烟酒不分家”，那就势必被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所打中，害了革命，也害了自己。常言说：“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短。”受了阶级敌人“来”的“礼”，“往”的就是革命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同敌人送来送去，结果就会“送”掉革命原则，“送”掉阶级立场，给敌人打掩护，作敌人的“防空洞”，甚至被敌人拉下水。因此，一个革命者对敌人讲“礼”，就是对贫下中农、革命人民讲“狠”；对敌人讲“礼”，就是政治上开始堕落的表现。我们千万不能上“礼尚往来”的当！

“在人民内部，‘礼尚往来’没啥问题。”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礼尚往来”，不仅是阶级敌人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腐蚀劳动人民思想的一种毒剂。送“礼”，就是铺张浪费，它同劳动人民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是完全对立的。一个人对“礼”发生了兴趣，就表明资产阶级思想的病菌已经侵入了他的肌体，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毛主席教导我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礼尚往来”直接违背了

毛主席这一光辉教导，还能讲“没啥问题”吗？！“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我们革命队伍中，必须坚决反对那种你送我一点、我送你一点的极其庸俗的作风。

当前，农村喜获丰收，革命形势大好。但是阶级敌人并没有睡觉，“四旧”并没有绝迹。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铲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彻底埋葬孔孟之道，让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占领思想阵地，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解放日报》）

彻底埋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鬼话

上海县 辛农文

几千年来，从历代的封建帝王到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都把“孔孟之道”视为“失之则死，不可暂无”的法宝，视为维护他们反动统治的护身符。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就是他们大肆宣扬的“孔孟之道”的一个组成部分。

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拆穿西洋镜，这是一切剥削阶级为了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用来欺骗人民、愚弄人民的鬼话。就是要劳动人民对反动统治阶级不要反抗，不要斗争；鼓吹一切的一切都是所谓命里注定的。这是极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宿命论。

解放前，我们贫下中农上无片瓦，下无寸地，靠野菜充饥，靠当长工糊口，生了病没钱医治，往往小病成大病，大病便丧命。解放后，我们贫下中农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朝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前进，革命、生产蒸蒸日上。贫穷落后的农村，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贫下中农为什么在解放前那样苦？解放后那样幸福？难道是我们的“命”突然都变好了？不，决不是。解放前，我们贫下中农所以受苦受难，是因为身上压着三座大山，政权不在我们劳动人民手里。解放后，我们贫下中农翻身作了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靠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靠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天照。老贫农说得好：我们不信天，不信地，全信毛主席的领导，全信咱们自己的印把子！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却胡说什么“一生富贵何可期，胡不及时以行乐”，这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丑恶灵魂。刘少奇叫嚷要追求什么“富贵”，这是同孔孟之道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鼻孔出气的，他的罪恶目的就是麻醉、腐蚀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妄图使我们忘记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忘记“权”字，不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便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一九六二年刘少奇的黑《修养》重新出笼后，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大搞翻案活动，有的拿着窝藏多年的地契等变天账，对贫下中农疯狂叫嚣什么：“牛吃稻柴，鸭吃谷，各人自有各人福。”“同伞不同柄，同人不同命”，向贫下中农、集体经济反攻倒算。我们贫下中农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打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国亿万革命人民又揪出了他们的黑后台刘少奇。但是“鱼死眼不闭”，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死亡的。有的阶级敌人散布“听天由命”的反动观点，胡说什么“千算万算，不如天老爷一算”，妄图动摇我们夺取丰收的信心，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孔孟之道”是阶级敌人搞翻案和破坏活动的破烂武器，我们要彻底批判这种反动论调。敌人在那里翻案，我们就在那里把他打下去；敌人在那里搞破坏，我们就在那里把他粉碎。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贫下中农要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同孔孟之道实行彻底的决裂，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思想，连同它的吹捧者刘少奇彻底埋进历史的垃圾堆。

（原载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

坚持晚婚 继续革命

——斥孔孟的反动婚姻观

松江县 红 松

“早生贵子早得福”，这是剥削阶级反动、腐朽的婚姻观，是孔家店里的破烂货。尽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猛烈地冲刷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但是，“四旧”的残余影响还是存在，这种提倡早婚的孔孟之道还有一定的市场，需要我们继续运用革命大批判的武器，把它批倒批臭，肃清其余毒。

孟子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就是说，不生儿子，是最大的“不孝”；要做到“孝”，就要早结婚，早生儿子，以便“传宗接代”。其实，孔孟的所谓“孝”，无非是要为没落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尽“孝道”；他们所需要的“后代”，就是培养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为维护 and 继承他们的反动统治服务。正因为这个缘故，一切剥削阶级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反动统治者，都把这种孔孟之道奉为“圣经”，用来欺骗、麻醉、毒害劳动人民。历代封建王朝是这样，袁世凯、蒋介石是这样，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也是这样。刘少奇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对孔老二顶礼膜拜，大肆贩卖孔孟

之道，向青年灌输资产阶级思想，宣扬早婚。他公开叫嚷：“对婚姻恋爱问题不要干涉，早婚……也不要干涉”，甚至还要给青年办“婚姻介绍所”，妄图利用早婚来腐蚀青年一代，真是毒透毒透！

孔老二和刘少奇之流，虽然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他们的阴魂不散，还时刻想借尸还魂。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了进行垂死挣扎，正在祭起孔家店的黑旗，捡起刘少奇的破烂，鼓吹早婚，复活“四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向无产阶级进攻。他们胡说什么“二十无子平平过，四十无子冷清清，六十无子断烟根（没有后代）”，用这种反动、腐朽的婚姻观来同我们争夺青年。我县城北公社光明一队有两个没有改造好的富农分子，到处向青年宣扬“早生儿子早当家”，灌输剥削阶级的毒素。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自己年龄不到二十岁的子女拉在一起，搞早婚的“样板”，大刮“四旧”妖风。这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千万不可等闲视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早婚还是晚婚，这决不是“生活小事”，而是反映了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婚姻和幸福观。“早生贵子早得福”，这是封建地主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婚姻观和幸福观，它的核心是一个“私”字，来源于“一切为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剥削阶级世界观。有些青年受到这种腐朽的婚姻观和幸福观的影响，成天追求个人的“幸福”，热衷于谈情说爱，迷恋于“大胖儿子热炕头”的小家庭生活；结果，越来越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意志衰退，学习没有兴趣，工作没有劲道，逐步滑进了修正主义的泥坑。这样的事例，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相反，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一切为公、一心为公的世界观。在无产阶级看来,个人的婚姻恋爱问题,个人的幸福,是同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也谋幸福,但不是谋个人的“幸福”,而是谋阶级的幸福,谋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作为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改造社会,改造自然,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贡献,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们提倡晚婚,就是使青年人不要沉湎、迷恋于小家庭的生活,以便让青年人抓紧这个时期,刻苦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在三大革命运动的洪流中不断提高政治觉悟,不断增长为人民服务,为革命献身的才干和本领,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由此可见,两种婚姻观和幸福观,实质上是关系到两个阶级争夺青年的大问题,是关系到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大问题。

提倡晚婚,实行计划生育,这是国家的需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的需要。一切有志的青年一定要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批孔孟之道,狠批刘少奇的“婚姻介绍所”的修正主义黑货,同“早生贵子早得福”的陈腐观念进行坚决的斗争!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解放日报》)

妇女力量半升天

——批孔子轻视妇女的反动思想

上海县 余 红

代表没落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孔老二，从他极端腐朽反动的阶级本性出发，一贯轻视妇女，他胡说什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把这句话译成现代语，那就是：妇女和“下等人”是最难弄的，你接近她吧，她就对你没大没小，没有礼貌；你疏远她吧，她可又要埋怨你、骂你。孔老二这种轻视妇女、污蔑妇女的反动思想，几千年来谬种流传，危害极大，我们必须痛加批判，彻底肃清其流毒。

在黑暗的旧中国，妇女没有丝毫社会地位。长期来，她们被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所统治，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所支配。这四种权力，就象四条沉重的精神锁链，套在妇女的身上，使她们不得不听人摆布，任人愚弄，成为“会说话的牛马”，生儿育女的工具。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广大劳动妇女才真正从那些封建的精神枷锁下解放了出来，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史无前例地成了社会的主人，实现了男女平等。但是，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妇女工作路线，严重地干扰了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致使那种轻视妇女的封建思想仍有一定的市场。

“妇女力量半升天。”在我国，妇女约占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支强大力量。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事实正是这样。解放以来，广大劳动妇女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同全国劳动人民一起，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劳动妇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革命和生产中创造出了无数英雄业绩，涌现出了许多先进人物。我们上海县陈行公社芦胜大队，就是一个妇女力量起着“半升天”作用的先进大队。在这个大队里，妇女劳动力占全大队劳动力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她们已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主要力量。过去只有男劳动力才能干的一些重活、难活，不少妇女现在同样可以干，而且工效很高，甚至跑在男劳动力的前面。这里的革命妇女不但是农业生产上的一支大军，更重要的她们还是抓革命的骨干力量，在阶级斗争中站在第一线，与阶级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全大队十七个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成员中，有五十多名是女同志。这铁一般的事实，难道不是对孔孟之流轻视妇女的封建宗法观念最有力、最深刻的批判吗？

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受了轻视妇女的封建思想的残余影响，往往用旧眼光来看待新事物，看不到广大革命妇女由于社会地位的改变而发挥出来的重大作用。他们看革命妇女同志

的消极因素多,看她们的积极因素少。当然,有些革命妇女同志身上是存在某些弱点,比如有自卑心理,家庭观念较重等等;但是,我们必须对这些弱点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要看到,这些弱点并不是妇女同志本身的过错,而是罪恶的孔孟之道、罪恶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是几千年来反动统治者用封建宗法观念坑害妇女的烙印。今天,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广大革命妇女完全能够在参加三大革命的斗争中不断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观念,克服自己身上的某些弱点。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应当同轻视妇女的封建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积极帮助革命妇女同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挥她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热情鼓励她们大胆地工作,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增长自己的才干,为革命作出更多贡献。广大革命妇女也要遵照毛主席“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教导,同各种轻视妇女的封建思想残余作斗争,积极投入三大革命运动中去。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解放日报》)

驳“父母在，不远游”

华 锋 汉

统治了中国思想界二千多年的“孔孟之道”，流毒极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象毒菌一样侵蚀着人们的灵魂，表现在家庭关系方面，则是腐朽反动的家族主义。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家族主义，就是一种把人们束缚在狭隘的家族圈子里，实现封建的家长制统治的精神枷锁。孔孟家族主义的核心，就是“孝悌”二字。孔孟之流喋喋不休地鼓吹什么“事孰为大？事亲为大”，“父母在，不远游”等奇谈怪论，全是从“孝悌”的家族观念中产生出来的黑货。孝，就是对父母孝顺，悌，就是对兄弟友爱。这种抽掉了阶级内容的“爱”的说教，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鼓吹的超阶级的“人类之爱”是一路货色，完全是骗人的鬼把戏。

孔孟之流竭力宣扬的这一套家族伦理观念，完全是出于维护奴隶主、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需要。“事亲”和“忠君”，本来就是一根藤上的两个毒瓜。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就是它们最好的注释。在这里，所提倡的都是要人们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上自国君下至家族的封建

宗法系统的统治，俯首帖耳地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孝子”和“顺民”，从而使反动阶级的统治长治久安，所以，从封建余孽曾国藩到人民公敌蒋介石之流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无一不是孔孟家族主义的狂热鼓吹者。可见，所谓家族主义，完全是维护反动统治的护身符，是毒害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

一切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等等，最本质的就旧在一个“私”字上。在剥削阶级的心目中，子女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子女必须把侍奉父母当作自己最高的生活目的。这种浸透了剥削阶级极端自私自利的家族伦理观念，就是要把人们限制在狭隘的家庭圈子里，围着父母打转转。否则，如果“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要受到孔孟之道的谴责。自私成了“美德”，无私成了“缺德”，孔孟家族主义所宣扬的，就是这种腐朽透顶的反动道德思想。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不断地为“孔孟之道”招魂，他在黑《修养》中大肆宣扬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之道是“我国历代圣贤的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向人们鼓吹“做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哥哥，好朋友”。其罪恶目的就是利用孔孟的家族主义继续毒害人民，妄图把人们腐蚀成只顾个人的小家而不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知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不顾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普天下被压迫人民的翻身解放的政治庸人，磨灭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革命斗志，从而为他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准备条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革命变化。在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战略方针指引下，在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量的动人事迹，就是

对剥削阶级家族观念最猛烈的批判。他们豪迈地说：“疆场本来处处是，五湖四海是我家”，“我们奔赴祖国边疆闹革命，离父母远了，跟毛主席近了”，“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家庭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多么豪迈的语言，多么崇高的思想！回过头再来看看孔孟之流的“事亲为大”，“父母在，不远游”等无耻说教，相形之下，显得何等的渺小和丑恶！孔孟家族主义的陈腐说教与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以四海为家的伟大胸怀，是何等格格不入啊！一些受小家庭主义束缚而妨碍了自己继续革命的同志，难道不应当彻底肃清孔家店的一切流毒，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促进派吗？！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文汇报》）

从“学而优则仕”到“读书做官论”

南市区工宣队 南胜虎

“孔孟之道”是我国历史上最反动、流毒最深的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孔孟之道”所竭力宣扬的那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思想，被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奉为至宝，并且通过各种形式长期向人们灌输，成为一种极其顽固的传统观念。

“学而优则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书读得好的人就可以做官。它是孔孟和历史上一切反动剥削阶级为了他们肆意剥削、压迫、奴役劳动人民所编造出来的一套谎言。从字面上看，不管你属于哪个阶级，只要你书读得好，就可以当官。其实，天下哪有这等事，在旧社会里，文化知识总是被反动统治阶级所控制，所垄断，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根本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很多工宣队员，连学校的大门也没有踏进过，即使有极少数劳动人民获得这种机会，也是要你捧着《四书》《五经》，向你灌输一套奴化教育，要你俯首帖耳地为反动统治阶级卖命。剥削阶级总是把文化知识作为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重要工具。剥削阶级极力宣扬“学而优则仕”，无非是想以这个谬论来宣扬反动统治的“合理性”。这就是一切反动阶级都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吹鼓手的奥秘之一。

孔孟和一切反动剥削阶级把“学而优则仕”奉为至宝的奥秘之二，就是以此来掩盖激烈的阶级矛盾、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欺骗人民，愚弄人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除了宣扬反动阶级统治的“合理性”以外，它又是维护反动的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理论根据。反动阶级以种种说教要劳动人民相信读书好的人做官，鱼肉人民，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而劳动人民之所以受苦受难，做牛做马，全是由于没有文化、没有读书的缘故。似乎反动统治阶级之所以可以任意宰割劳动人民，就是因为读了书，以读书与没有读书的差别来掩盖激烈的阶级矛盾。这是极其反动的谬论。

同时，几千年来，孔孟和一切反动阶级宣扬的“学而优则仕”的一套谬论又是对人民的一帖麻醉剂。凡受了这种思想毒害的人，他们成年累月埋头于书本，“书中自有黄金屋”，一心向往“十年寒窗，一举成名”，梦寐以求的是“状元及第”，成了目光短浅的追求个人名利的蠹虫。这种人，不敢反抗，不搞斗争，不敢触犯反动阶级的一根毫毛，最终必然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

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对“孔孟之道”崇拜得五体投地，对“学而优则仕”的说教更是照搬不误，到处贩卖“读书做官论”的黑货。这个老反革命多次反复鼓吹什么“办学校时要告诉学生，好好读书，好好劳动，将来可以当工程师，当厂长”，“这些人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他们可以当小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厂长、党委书记、市长、县长等等”。其中虽然加进了“好好劳动”、“又能体力劳动”之类的遮人耳目的话，但并不能改变其反动实质。“好好劳动”，充其量是块“敲门砖”，一旦官运亨通，就可以高高在上、

养尊处优。刘少奇全盘继承“孔孟之道”，借助孔子的亡灵，用“读书做官论”对青年学生发动挖心战，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完全是为他的反革命政治服务的，是为了把青年一代引上钻书本、往上爬的资产阶级邪路，成为思想空虚、灵魂丑恶、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成为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刘少奇要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其目的就是要使学生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让他的阴谋得逞，“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彻底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给孔孟的“学而优则仕”这一套反动的传统观念和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以猛烈的冲击。但是，正如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那样：“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在“读书做官论”失去市场以后，又出现了“读书无用论”的反动思潮。有的同志批判得好，他们说：“过去，因为读了书可以当什么‘长’，什么‘家’，就拚命读书。现在，因为读了书要当农民，就认为‘读书无用’了。这正说明，在有些人的头脑里，那个无形的‘孔夫子’和‘刘少奇’还是很有‘权威’的。”“孔孟之道”的那套轻视劳动，脱离劳动，把读书与劳动截然割裂，以知识的多与少为标准，划分成森严的等级，这种思想余毒在我们某些人的头脑里还在起作用，在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运动中，不是又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吗？那就是把劳动分成等级，说什么“分配到工矿最理想，分配到农场还可以，分配去插

队落户最倒霉”。显然，把体力劳动划分等级，实质上仍然是“追名求利”，是孔孟以至刘少奇的从极端“私”字出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让我们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武装头脑，以“老三篇”为座右铭，彻底肃清“学而优则仕”和“读书做官论”的余毒，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思想阵地。

（原载一九六九年八月五日《文汇报》）

彻底粉碎刘少奇宣扬孔子反动教育 思想的罪恶阴谋

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打破了我两千多年来对孔子的迷信。但是，在此后的五十年内，“反孔”与“尊孔”、“打倒孔家店”与“保护孔家店”的激烈的阶级大搏斗，一直在绵延不断地进行着。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继康有为、胡适及独夫民贼蒋介石之后，在他的黑《修养》里，大肆宣扬“孔孟之道”，毒害广大党员和群众。全国解放以后，刘少奇又跑到曲阜重演“朝圣”的丑剧，并叫嚷什么“孔夫子是圣人”、“教育家”，“应该充分利用孔子”，要人们去读“孔夫子的书”，说什么无产阶级必须对孔子持“宽大政策”。为了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刘少奇特别看重争夺教育这块上层建筑的重要阵地。他把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货色熔于一炉，疯狂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和腐蚀青年学生。

因此，要彻底肃清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就必须彻底批判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就必须彻底批判剥削阶级反动教育思想体系，把“打倒孔家店”的战斗进行

到底！

剥削阶级的“师表” 劳动人民的死敌

被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吹破了天的孔子和孔家店，到底是什么货色？

孔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他所处的时代（公元前五五一年至前四七九年），正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动时期，他目睹奴隶制统治的解体，周王室的衰微，诸侯的“僭越”，而无限感慨。他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梦想恢复殷周“全盛”时期的奴隶制统治，对于一切破坏旧制度的社会现象极端仇视。如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反映封建生产关系）、晋国的“铸刑鼎”（反映封建立法）等社会改革，都竭力攻击。他还利用职权杀过要求改革的人。

孔子一生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教育，为复辟奴隶制度制造舆论，训练反动统治阶级维护旧制度所需要的忠顺奴仆。他把殷周奴隶制社会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经验，传授给他的学生，并带领他们“周游列国”，到处奔走呼号。

用那个阶级的政治思想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决定着教育的性质。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仁”和“礼”。所谓“仁”，就是讲在奴隶制度下人和人的关系，孔子曾把仁字解释为“爱人”，他爱的是奴隶主阶级，讲人与人的关系，也无非是为了讲求奴隶制度的长治久安。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维护奴隶社会等级分明的制度，要上下各安其位。所谓“礼”，就是遵守奴隶制社会等级制度的各种规范。在孔子看来，只要恢复这套等级制度，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

名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能达到“仁”的理想社会，这就是他所说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孔子认为，被统治者只能永远安于被统治地位，俯首帖耳地忍受剥削和压迫，绝不能“犯上作乱”，有丝毫反抗。

孔子在传授学生的所谓“六艺”中，“礼”是被放在第一位的。把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各种规范放在第一位，这就是他办教育的指导思想。孔子的这套说教，是对奴隶社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产生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压迫和被压迫关系，在理论上的肯定，也就是为“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制造反动的理论。孔子根据奴隶社会出现的阶级的对抗，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离和对立，提出培养知“礼”的“仁人”“君子”，来统治“下愚”的“小人”。把教育作为维护没落奴隶主贵族对广大劳动人民统治的工具，为奴隶主专政服务。

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孔子公开号召学生“读书做官”。他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你想耕地生产么，是要挨饿的，读书吧，高官厚禄就有了。孔子的学生子夏把孔子“读书做官”的思想表达得更为清楚：“学而优则仕”，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读书做官”这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社会的产物；是以阶级对抗和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为前提，而产生的一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随着阶级对立的产生，少数剥削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也垄断了劳动人民在劳动中创造的文化，教育成为培养一小撮“治人”的“劳心者”，巩固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统治的工具。孔子总结了奴隶社会教育为奴隶制服务的经验，明确地表达了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思想。

为了培养维护奴隶制统治的工具，孔子的教育内容，就是

直接传授给学生一套统治劳动人民的经验。《论语》一书，是反映孔子思想的代表作，是他回答学生问题的记录，通篇充斥着学生向他“问政”和他关于如何“为政”的答问，都是讨论“何为则民服”、“何为则民易使”的统治术。

孔子的教育思想，集中地反映了奴隶主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敌视。孔子的学生樊迟“请学稼”，被他骂为“小人”。对于教育为什么与生产劳动相分离，孔子说的很清楚：只要学会统治劳动人民就行了，“焉用稼”，体力劳动那是“小人”的事情。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早在三十年代批判孔子时，就一语道破地指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统治民众的，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正因为这样，所以后来一切剥削阶级都把孔子奉为“万世师表”，并且加以神化。孔子的教育思想也就为后来一切剥削阶级所继承，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用来愚弄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对象孔子这样的没落奴隶主贵族“教育家”及其反动的教育思想，奉若神明，极力宣扬，使这个幽灵重新游荡起来，其目的是为他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效劳。

求助孔子的亡灵 阴谋复辟资本主义

利用古人来宣扬本阶级的反动的政治思想，是一切剥削阶级实行反革命复辟和反革命专政的一种手段。刘少奇为孔家店招魂，就是为他的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效劳的。

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孔子的一整套反

动的教育思想和他的一生的教育实践，无非是总结奴隶社会训练官吏的经验，无非是培养为维护 and 复辟旧制度所需要的忠顺奴才。大叛徒刘少奇很懂得这一点，在全国解放不久，就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反动口号。还说“大的政治运动今后不可能再有了，主要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所以需要调配大批干部投入经济建设中去。我们国家建设的两项主要工作，一项是经济建设，一项是文化建设。”他所谓的“建设”，根本不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而是要发展资本主义。用他的话来说：“社会主义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出过早”，“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所以他声嘶力竭地鼓吹“你们学习的任务是建设”。在这里，刘少奇把他办教育的目的说得很清楚：就是培养为他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官吏。

如同孔子为复辟奴隶制训练官吏而号召“学也，禄在其中矣”一样，刘少奇大肆鼓吹“读书做官论”。叫嚷“我们的培养目标应该培养到当干部、当技术员、当工程师的水平。”还胡说什么“要告诉学生，好好读书，好好劳动，将来可以当工程师，当厂长。”他公开向青年灌输剥削阶级的名利思想，要青年“成名成家”。在刘少奇眼里，只瞧得起干部、工程师、厂长，而认为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人类历史的伟大创造者，是无足轻重的。这和孔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完全相同的。

一切反动阶级为了维护和复辟旧制度，总是千方百计抹杀和掩盖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孔家店所宣扬的“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德报怨”，等等，就是要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忍受压迫和剥削，不要斗争，不要反抗。为复辟资本

主义的反动政治目的所决定，刘少奇极力用“阶级斗争熄灭论”麻痹人们的思想。他公开号召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一面阻挠学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一面用孔家店的“忠恕”之道毒害青年，要他们“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刘少奇引诱青年走“三脱离”的道路，其反动目的就是要使青年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庸人，以便刘少奇一伙复辟资本主义。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对立，是一切剥削阶级教育的本质所决定的。孔子极端鄙视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也是这样。他极力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反对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但他比孔子更狡猾，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他不能象孔子那样说：“焉用稼”，他打着红旗反红旗，说什么“要争取和鼓励学生升学，但是讲的要适当。不要说种地太脏，没出息，那样讲就是看不起农业，看不起体力劳动了。”这真是一幅反革命两面派、伪君子的维妙维肖的自画相。刘少奇竭力反对广大革命青年和工农兵结合，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劳动镀金论”。他对下乡的知识青年说什么：“种地，四五年后，你们能做的事，别人不能做，人家能做的事，你们也会做。到那时，你们可能被选当乡干部、县干部、省干部，当中央干部。”他还说：“人生在世都要准备几条办法”，“读书做官”是“上策”，下乡劳动是“下策”。劳动镀了金又当上官，仍不失为“上策”。万变不离其宗，目的只有一个——当官。刘少奇就是用这种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毒害青年，使她们把劳动作为升官的阶梯。

从有阶级社会以来，教育从来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里面，有两句极其反动，而又很能说明教育

的阶级性的话。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就是说剥削者与被剥削者是不能改变的，剥削者受教育，为的是叫他们学会统治被剥削者，而被剥削者受教育，为的是让他们更好地听从剥削者的使唤。大叛徒刘少奇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提出一个所谓“两种教育制度”。什么是“两种教育制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全日制学校“是国家办的，质量要求高”，“家庭供得起的”，“优秀的考上第一类学校”，培养“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教授等”；半日制学校招的是“家庭供不起的”，“次一些的”，是培养“有文化科学知识、有技术、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刘少奇恬不知耻地吹嘘这是什么“消灭三大差别”、“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三大措施之一。他象孔子周游列国一样，不惜跑遍半个中国到处游说，大肆贩卖他从没落、腐朽、反动的奴隶主贵族教育家孔子那里捡来的古董，从资产阶级那里贩来的“双轨制”黑货。刘少奇的第一类学校，培养的所谓“优秀的”，不就是孔子所谓“上智”的“爱人”的“君子”吗？刘少奇说第二类学校培养的所谓“次一些的”，不就是孔子的所谓“下愚”的、“易使”的“小人”吗？所不同的是，刘少奇把“小人”改名叫“新型劳动者”罢了。他所要培养的“新型劳动者”，其实就是他复辟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剥削对象。正象斯大林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的生产力所需要的是比闭塞无知的农奴们文化些，伶俐些，能够懂得机器并正确使用机器的生产工作者。因此，资本家宁愿利用免除了农奴制羁绊而有相当文化程度来正确使用机器的雇佣工人。”这种所谓“两种教育制度”，不仅不是“消灭三大差别”，正是扩大三大差别；不仅不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正是开足马力向资本主义开倒车，复辟那种由少数人

压迫、剥削多数人的、由地主资本家专制的剥削制度。这就是刘少奇贩卖孔子教育思想的反革命政治目的。

无产阶级必须在教育领域实行全面专政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因此，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领域中，彻底扫清旧制度的垃圾，彻底批判剥削阶级反动教育思想体系，建立无产阶级在教育领域的全面专政，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之一。

孔子和他所竭力维护的奴隶制度，已经是历史的陈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可是，从孔子到刘少奇的反映几千年剥削制度的反动教育思想，从这些腐尸中散发出来的臭气，仍然象鬼蜮幽灵似地顽固地挣扎着，不断变幻形骸，毒害人们的灵魂。深入批判集一切剥削阶级思想之大成的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是思想战线、教育战线上的一项重大战斗任务。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战斗号令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开进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打破了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论”、“劳动镀金论”等从孔子到刘少奇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受到了最猛烈的冲击。

遵循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伟大教导，举国上下，掀起了一个气势磅礴的教育革命新高潮。广大革命师生主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积极改造被剥削阶级占领了几千年的这块教育阵地；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争先上山下乡，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光辉道路，“五·七”学校如雨后春笋到处出现。无产阶级正在从事的这一场深刻的伟大的教育革命，是对孔子到刘少奇的反动教育思想的最有力的批判，是同几千年来的剥削阶级教育制度最彻底的决裂！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不时变换口号，妄图重新占领失去的“世袭领地”。

事实不正是这样的吗？当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师生深入批判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和孔家店的“学而优则仕”的时候，一小撮阶级敌人便大肆散布什么“读书吃亏论”、“读书无用论”、“教书倒霉论”、“文化工作危险论”等蛊惑人心的奇谈怪论。当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师生深入批判刘少奇的“劳动镀金论”和孔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时候，一小撮阶级敌人便大肆散布“劳动惩罚论”、“劳动省心论”，妄图破坏革命干部、知识青年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瓦解人们的革命斗志。

我们的一些同志，对于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认识不清，没有深刻认识阶级敌人散布这种反动论调的罪恶用心，或则受其影响，或则无意识地为之传播，这说明孔家店的反动教育思想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余毒，还没有彻底肃清。我们的这些同志要好好地想一想，如果让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让一小撮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来统治广大劳动人民，那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就

会变质，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资本主义就要在中国复辟。这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广大劳动人民说来，才是最大的“吃亏”、最大的“倒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在教育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彻底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彻底打破几千年来剥削阶级对教育的垄断，把教育大权牢牢掌握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手中，必须把那一向被剥削阶级所垄断的、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知识还给劳动人民，把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和孔子的“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谬论予以彻底埋葬。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绝对不能再容许教育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用来培养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的精神贵族。我们要培养的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此，必须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论”的流毒。

毛主席早在三十年前就教导我们：“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主席发出对知识分子“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的伟大指示，毛主席还明确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这些伟大教导，给广大青年指明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广大知识青年要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坚决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自

觉地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我们的时代，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光辉旗帜的伟大新时代，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光荣任务是：在彻底批判旧教育制度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斗争中，创造出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让我们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阔步前进！

（原载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九日《光明日报》）

砸烂孔子教育观上的三块黑牌

洪 教 施

在阶级社会中，教育和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把学校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则妄想把学校变成“和平演变”的工具。学校为那个阶级培养接班人，贯彻那个阶级的路线，这是教育领域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刘少奇在文教界的大阎王陆定一，曾经疯狂地叫嚣：“在学校里马列主义要教，孔夫子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也要教”。其实，搞马克思是假，搞孔夫子，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是真。他们推行的那套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是货真价实的封、资、修大杂烩，他们的“教人”，就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他们的“治国”，就是恢复旧中国！

现在我们来看看，刘少奇、陆定一为孔子反动教育观叫喊得最起劲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而优则仕”这三件破烂究竟是什么货色，以及他们怎样利用孔子的这些破烂，由“教人”进而“治国”的。

“有教无类”——

为资产阶级子女争取优先入学

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在社会主义中国，学校的大门首先向工农子女敞开着。这是一条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可是，刘少奇的黑干将陆定一却胡说什么“孔子说‘有教无类’，对不对？我说对，还是‘有教无类’”。

好一个“还是‘有教无类’”！

孔子为挽救垂死的奴隶制统治，急急忙忙办起私学，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吸血鬼（奴隶主、新兴地主、富商以及统治阶级的没落分子）及其子弟，只要可以囊括到的尽量搜罗起来，企图把他们训练成为一批甘愿为奴隶制殉葬的反革命骨干。这就是“有教无类”的庐山真面目。很清楚，孔子对一切剥削阶级确实是“有教无类”的，而对于劳动人民，则不把他们放在“有教”之列。怎么可以设想，连人身自由都没有的奴隶，可以坐上孔子的马车整天跟他去东游西逛呢？怎么可以设想，一个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反对奴隶解放的人，会同奴隶们弦歌论道呢？跟着刘少奇、陆定一指挥棒团团转的尊孔派老爷们胡诌什么“不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人”，“奴隶也有了学文化的机会”，真是一则新“天方夜谭”！这不只是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无耻可笑，更是一种反革命阴谋！

陆定一之流鼓吹“有教无类”，当然是有所为而发。在他们看来，今天社会主义学校不是“一视同仁”的，所以才提出“还是”要“有教无类”。很清楚，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路

线。

“无类”，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只是在讲讲“平等”，其实是一场骗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从来就没有什么平等。

当政权掌握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手里的年代，什么时候允许劳动人民有受教育的平等呢？他们“将工农群众排除于教育之外”，造成“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难道这就是他们给劳动人民的平等吗？

为什么他们大叫大嚷要“有教无类”呢？这是他们反对党的阶级路线，推行资产阶级阶级路线的挡箭牌！迫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既不敢公然下一道命令限制工农及其子女入学，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宣布让资产阶级子女优先入学，于是就打出孔子的“有教无类”这面破旗。他们所说的“有教无类”，就是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刘少奇曾经公开说过：资产阶级子女“同样是按考试成绩入学”。拆穿了，就是妄图依靠他们在文化上还占有的那么一点优势，在“有教无类”的烟幕下，尽量把工农子弟挤出学校大门，让资产阶级子女捷足先登，爬上“小宝塔”尖上去。有了资产阶级的这种“无类”标准，就没有劳动人民的“有教”权利！“分数线，分数线，就是对劳动人民的封锁线！”这就是广大劳动人民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控诉！这就是对陆定一之流鼓吹“还是‘有教无类’”的无情揭露！

刘少奇、陆定一之流鼓吹的“有教无类”，也就是凯洛夫的“全民教育”。在政治上他们妄图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教育上就宣扬“全民教育”，亦即“有教无类”。这个口号集中地代表了资产阶级在教育方面的利益。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

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失败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又打破了资产阶级妄图同共产党“轮流执政”的迷梦。但是，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还保有相当的优势，而且他们懂得，知识技能是不能象财产那样被没收被剥夺的，于是希望他们的子女通过“读书做官”这个渠道，由抓笔杆子到抓印把子。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第一步就必须反掉党在教育工作中的阶级路线，让资产阶级子女优先入学。这就是刘少奇、陆定一这伙最大的尊孔派鼓吹“有教无类”的要害所在！

“因材施教”——

为资产阶级拔尖选苗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刘少奇、陆定一之流要把工农子女统统关在学校大门之外，是根本办不到的。对于这一点，他们仍然是心犹未甘。于是，又从孔家店里搬出了“因材施教”的破烂。陆定一大叫大嚷什么：“因材施教，孔夫子就讲的”，“不因材施教，就是官僚主义”。二阎王周扬更露骨地宣称：“培养人”也“要找出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我提倡孔夫子的办法，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说孔子有“因材施教”，不是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新发明，而是宋代反动思想家朱熹，根据《论语》为孔子归纳炮制出来的一个教育命题。他说：“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此后，孔子就成了“因材施教”的老祖宗，他的“因材施教”就被捧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育“法规”。

剥开孔子“因材施教”的画皮，其妙用有二：一是使学生

“就范”：对于象子路那样“其言不让”，敢于破坏山规，“陵暴孔子”的学生，孔子就要“压”他一手；对于象冉有那样“不悦子之道”，信教不笃的学生，孔子就要“推”他一把，鼓励他去为奴隶制“守死善道”，如再不听，就不再承认他是学生，孔子就要骂街：“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或“压”或“推”，一个目的，就是使之“就范”，一切听从孔子的指挥。二是“拔尖”：在门徒中，选择最中意的材料，精心加以训练，使之成为维护奴隶主贵族政权的得力干将。号称弟子三千的孔子，据说培养出所谓“异能之士”七十二人，见于书传的三十五人，列于“四科”的十人而已。就是这批学生，一出孔门“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差不多个个高官厚禄，飞黄腾达。这就是孔子“因材施教”的结果，也是“因材施教”的目的！

陆定一之流鼓吹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一是，妄图使无产阶级教育从根本上摆脱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放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他们的反动世界观来溶化工农子弟，使他们在学校就成为驯服工具和恭顺的奴隶，以便将来当个资产阶级的“好仆役”。二是，使资产阶级子女得到拔尖培养。他们所鼓吹的“因材施教”，就是“因”智育第一之“材”，“施”拔尖培养之“教”。这种“因材施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天才教育”、“能力分组”那一套货色。资产阶级在文化教育上还残存着一定优势的情况下，去搞什么“因材施教”，其反革命目的，戳穿了说，就是要为资产阶级“拔尖选苗”，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

列宁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分子总是认为只有富人才能受到真正的教育，认为大多数劳动者不能成为生活的真正主人，只须训练成好仆役好工人就够了。”这是对刘少奇、陆定一鼓

吹的“因材施教”的最有力揭露和批判。

“学而优则仕”——

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刘少奇、陆定一之流，疯狂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胡说“培养目标是普通劳动者”这个口号“不妥当”，“偏了”，竭力鼓吹“读书做官论”。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孔子一样，不仅自己是一个利令智昏的野心家，也是“学而优则仕”的头号吹鼓手！孔子说，不愁没官做，只愁没本事，即所谓“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刘少奇也说什么“有了文化，学会了农活，跟群众关系好，具备这三条，就有可能当乡、县、省干部，也可能到中央，那就看个人的本事了”。刘少奇的黑话和孔子所叫卖的，完全是一路货色。

如果说“学会了干农活”、“跟群众关系好”这两条也是能否“当上干部”的“本事”，这只是教会青年欺世盗名的“本事”。“当官”的真正“本事”靠什么？在刘少奇看来就是一条，曰：“有了文化”。他教唆青年说：“你们能够办的事，农民办不了，他们没读过书。”“你们有文化，农民没有，比农民多一条”。将来中央、省、县领导工作“就是你们来接替”。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地主和一切剥削阶级垄断了由劳动人民血汗造成的文化，反过来又以此鄙视劳动人民，拿他

们所垄断的文化作为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刘少奇正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文化的作用的。在这个老反革命眼里，有没有文化，是能不能当上干部的唯一条件。贫下中农干活干得再好，群众关系再好，但没有文化，还是不能当干部的。“有了文化”这“一条”就是做官当老爷的资本，就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的资本。请问，刘少奇所谓的比农民“多一条”，与奴隶主思想家孔子的“学也，禄在其中矣”，有什么两样？这“多一条”，与封建地主士大夫的“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有什么区别？这“多一条”，与赫鲁晓夫鼓吹的“相信自己的力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拥有很好的知识”，有什么不同？什么“多一条”，在他们看来，有了这“一条”，简直就有了“一切”，就能当官，就可以发财。

刘少奇早在一九四一年说过：“因为人们社会环境不相同，如有些人读书，有些人不读书，于是社会上有分工，有职务事业的不同，职权的不同。”看！说得多么赤裸裸呵！这是地地道道孔子的再传弟子孟子反动的“社会分工”论的黑货。“有些人读书，有些人不读书，于是社会上有分工”，这不就是“或劳心，或劳力”吗？“职权的不同”，这不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吗？“职务事业的不同”，这不就是“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吗？解放后，刘少奇不敢公开再把这一套赤裸裸的反动谬论拿来上市，于是转弯抹角，宣扬“有了文化”这“一条”，就能当官发财。二者包装不同，货色一样，全是从孔孟那里贩来的破烂。必须指出，既然工农子弟通过他们的“因材施教”，已经注定地要进“半工半读”学校，被训练成为有文化的奴隶；那么，所谓“读书做官”，自然就更多地是资产阶级子弟的份了。资产阶级子弟可以顺利地由小学、中学到大学，然

后，被安插提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阶级斗争的现实已经证明了刘少奇、陆定一这一伙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就是这么干的！他们把一大批思想没有得到很好改造的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弟，塞进党、政、军等机要部门中去，有的则提拔到领导岗位，其反革命目的，就是妄图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

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刘少奇、陆定一之流，特别起劲地叫卖孔子的“学而优则仕”、“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这三件破烂，也完全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他们企图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于是大肆鼓吹“学而优则仕”。为了贯彻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又利用剥削阶级在文化上在一定程度上的优势，打出“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这两面破旗，对工农及其子弟左推右压，让剥削阶级及其子女可以优先爬上他们早已设计好了的“小宝塔”尖子上去。如果让他们这一套阴谋得逞，那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那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子看作护身符，一次又一次地给这具僵尸加冕，最后给他戴上了一顶“万世师表”的桂冠。但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乞灵于孔子的，除了一代又一代的封建统治者，就是那些窃国大盗、独夫民贼、汉奸走狗之流。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清楚地看到，为孔家店守灵的群丑中，又多了刘少奇这个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孔子作为他们的表率，真是当之无愧的。“万世师表”乃是地地道道的万世贼表。

（原载一九七〇年三月二日《文汇报》）

从“四氏学”看孔子“有教无类” 的反动本质

永 卫 东

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孔子，为挽救奴隶主即将灭亡的地位，打出了所谓超阶级的“有教无类”的反动教育思想，招摇撞骗，蛊惑人心。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陆定一之流，出于反革命复辟的需要，也扯起“有教无类”的破旗，胡说什么：孔子的“有教无类”“打破了阶级界限”，“把教育从贵族和奴隶主普及到平民中去”了，是有“人民性”的。

孔子的“有教无类”真的对各阶级一视同仁吗？不！这完全是欺人之谈。高唱“有教无类”的孔子，招收的学生就都是豪门大族的子弟，连相传“箪食、瓢饮、居陋巷”的大弟子颜回，也是“世世仕鲁为卿士”的官僚子弟。我们从“四氏学”来看，更有力地暴露孔子“有教无类”的反动本质。

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孔子的孝子贤孙就在孔庙西侧开办了“孔氏家学”，专门培养孔氏大地主的子孙。后来，他们又把“孔氏家学”扩大为孔、孟、颜、曾四氏地主集团（即孔子、孟子以及孔子的弟子颜回、曾参四氏地主集团）的家学，这就是“四氏学”。

“四氏学”的学生，全部都是孔、孟、颜、曾四氏中的朱门阔

少、地主崽子。“四氏学”培养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谓“仁人”、“君子”、“贤人”，即“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谓“贤才”，就是统治劳动人民的本领。文的能给封建朝廷出谋献策，“治国安民”；武的能在农民起义之时，走马疆场，为其“削平内乱”、“打平天下”，以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这就是“四氏学”“上报国恩，下立人品”、“以供朝廷之用”的真实目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四氏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许多人中了进士、翰林，做了知县、知府、按察使、员外郎和各部主事，成为劳动人民的凶恶敌人。

这个培训封建地主阶级爪牙的反动学校，在历代封建阶级庇护下，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后，“衍圣公府”在反动政府支持下，采取改头换面的办法，把“四氏学”改称“明德中学”，继续为剥削阶级培养忠实接班人。试看，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招收学生八十人，有六十多人是孔、孟、颜、曾四氏地主崽子，其余的也是地主子弟。毕业生都做了官僚地主、国民党反动派的骨干分子。

铁证如山！这哪里是“有教无类”？社会，是阶级的社会；人，是阶级的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哪里有超阶级的教育思想？剥削阶级要“教”的是剥削阶级的接班人，是剥削阶级的子弟；无产阶级要培养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工农兵的子弟。超阶级的“有教无类”不过是剥削阶级的一块遮盖布而已。“四氏学”的不容辩驳的事实，不是充分说明了吗？

从“四氏学”，我们完全看清孔子“有教无类”这面破旗的反动性。而刘少奇、陆定一流却拚命鼓吹孔子的“有教无

类”，抹杀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实质，偷运苏修“全民教育”的黑货，公开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方针相对抗，为地主、资产阶级子弟入学大开方便之门，把学校变成他们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温床。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是“怯懦的运用魔法，求助于过去的亡灵”，来为他们今天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鉴别香花毒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四氏学”在这一望远镜和显微镜照耀下，彻底暴露了孔子“有教无类”的反动本质，也彻底暴露了刘少奇吹捧“有教无类”的丑恶嘴脸。让我们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把它批深批透，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认真搞好教育革命！

（原载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大众日报》）

学习鲁迅批判孔家店的 彻底革命精神

上海师范学院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写

编者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以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坚韧不拔、“大呼猛进”，向着两千多年来奴役人民群众的封建文化，向着虚伪残忍的孔孟之道，进行了英勇的冲击；他无情地批判了整个人吃人的旧世界，成为“五四”以来最坚定、最彻底的反对孔家店的杰出代表。今天重温鲁迅当年在战斗中写下的这些所向披靡的檄文，每个革命同志都可以从中受到极大的鼓舞，获得深刻的教益。

自从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后，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间围绕着尊孔还是反孔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阶级大搏斗。五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派，一切革命派都是反孔派。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场尊孔和反孔、复辟和反复辟、翻案和反翻案的斗争，仍然尖锐、复杂地继续进行着。一切革命的同志，千万不要以为写了几篇批

判文章，放了几发炮弹，孔家店的幽灵就从此烟消云散了。我们必须以鲁迅为榜样，进一步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更高地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对剥削阶级反动思想体系的批判深入下去，把“打倒孔家店”的战斗进行到底！

下面编选的是鲁迅批判孔家店的一些语录。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们在部分语录后面加了一点必要的注释和点滴学习体会，此类文字用楷体字标出，仅供参考。

一、无情揭露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日记》（一九一八年）

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九三五年）

注：“吃人”！这是鲁迅对孔孟之道最概括、最透彻、最无情的揭露。历来的剥削阶级标榜以“仁义”治国，其实“都是为了治民众”的。所谓“治”就是镇压、剥削劳动人民，就是“吃人”。揭开那些写满了歪歪斜斜“仁义道德”字样的遮羞布，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所谓“王道”、“仁政”都是妄言

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東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九三四年)

注：所谓“王道”，也就是“仁爱”，“仁政”。鲁迅在这里以“却是兄弟”四字，一语破的地指出“王道”和霸道，“仁政”和暴政，只不过是反动阶级交替使用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王道”、“仁政”的背后掩藏着的同样是血淋淋的杀机。反动阶级及其代表从来就没有对革命人民施行过什么“仁政”；同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

“中庸”、“宽恕”是剥削者的愚民哲学

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

《通讯》(一九二五年)

注：“中庸”，见《论语·雍也》，意思是折中、调和。鲁迅在这里指出，抬出“中庸”来，是剥削阶级所惯用的一种骗人伎俩。在阶级社会里，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根本不存在什么不偏不倚的“中庸”道路。

鲁迅曾淋漓尽致地刻划过这类“正人君子”的丑态：“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在现实生活中，这类“正人君子”并未绝迹，必须引起我们警惕。

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杂忆》（一九二五年）

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

《女吊》（一九三六年）

注：“犯而勿校”，见《论语·泰伯》，意思是侵犯了你，不要计较。这完全是剥削阶级愚弄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大肆鼓吹什么“不要报复”，什么“中国的民族性就喜欢宽大”，等等，其源就出于此。这里鲁迅所指出的“吸血吃肉的凶手”，同样也是刘少奇这条剥削阶级走狗丑恶鬼脸的写照。

“忠”、“孝”、“节”、“义”是维护 反动统治的礼教

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

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隔膜》(一九三四年)

……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九一九年)

不管你爱不爱，在周公孔圣人的名义之下，你得从一而终，你得守贞操。男人可以随时使用她，而她却要遵守圣贤的礼教，……

《男人的进化》(一九三三年)

“朋友，以义合者也。”古人确曾说过的，然而又有古人说：“义，利也。”呜呼！

《四论“文人相轻”》(一九三五年)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礼也。

《礼》(一九三三年)

注：“礼”，是剥削阶级伦理道德的最高规范。他们鼓吹“非礼勿视”等等，就是要被剥削者俯首帖耳任其宰割，听凭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勿需丝毫反抗，“静静的等着”剥削者“自毙”。这是孔孟之道极端虚伪地欺骗劳动人民的麻醉剂。

二、戳穿剥削阶级鼓吹孔孟之道的反革命阴谋

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

《忽然想到》(一九二五年)

注：这与马克思所说的，“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同一个意思。它告诉我们：利用死人来为活人服务，利用古人之口来宣扬反动的政治思想，从来是一切剥削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大肆叫嚷“应该充分利用孔子”，拼死为孔老二招魂，不正是为他进行资本主义复辟制造反革命舆论吗？

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嚼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九三五年)

注：孔老二活着时，确实并不那么得势的。他当过吹鼓手，人家死了人，去吹吹打打，也做过管线、管牛羊的小官，为权臣所轻蔑。什么“大成至圣文宣王”、“万世师表”之类“阔得可怕的头衔”，都是在他死后给加上去的。因为“种种的权势者”感到把这具僵尸“捧起来”越“吓人”，

越对他们有好处。全部奥妙就在于此。

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也就是恰如将他的钱试买各种股票，分存许多银行一样，其实是那一面都不相信的。

《难行和不信》（一九三四年）

反动统治者抬出孔子是为了“治天下”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

《十四年的“读经”》（一九二五年）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

《知难行难》（一九三一年）

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九三五年）

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凡是施展出来的，几乎全都施展出来了。上海的华界虽然接近夷（亦作彝）场，也听到了当年孔子听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

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

……我们除食肉者听了而不知肉味的“韶乐”之外，还要不知水味者听了而不想水喝的“韶乐”。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一九三四年）

注：第一次的尊孔“盛典”，指一九一四年窃国大盗袁世凯演的祭孔丑剧。第二次的尊孔“盛典”，在一九三四年，即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发动血腥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时，由人民公敌蒋介石导演的。在这场丑剧中，大演韶乐（传说韶是虞舜所作的乐曲），说什么这是“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鲁迅横眉冷对，深刻揭露了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民不聊生，老百姓连喝水都成问题的社会黑暗；辛辣地嘲讽蒋匪导演“尊孔祀圣”丑剧是为了配合其反革命屠杀。

二月十四日《申报》载南京专电云：“中执委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为各要人讥大家为“忘八”……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一九三三年）

注：鲁迅用“忘八”两字的谐音，影射和嘲讽人民公敌蒋介石之流是一伙满嘴“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

外国反动派“尊重”孔子是为了侵略

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

有些读书人说，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

《老调子已经唱完》（一九二七年）

注：鲁迅明明白白地指出：中国的旧文化是一切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者所利用的软刀子。可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里的一帮修正主义文人，竟明目张胆地诬蔑鲁迅主张旧文化有“永久的价值”。天下竟有这么无耻的谎言！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者，对鲁迅这样的诬蔑，倒是说明了他们与帝国主义者一样，想利用孔孟之道这把软刀子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

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九三四年）

注：鲁迅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这篇文章发表在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死劲地宣扬孔孟之道是“中国古有文化的核心”，它妄图利用孔孟之道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新药”！

三、坚韧持久地同剥削阶级旧思想作斗争

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九三〇年）

“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九二六年）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论睁了眼看》（一九二五年）

注：在批判孔家店这个旧社会和旧势力最顽固的反动堡垒的斗争中，我们十分需要发扬鲁迅这种坚韧、持久和针锋相对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即“痛打落水狗”的精神。那种认为“批判得差不多了”的说法，那种开几炮就算完事的做法，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天真想法，统统必须抛弃。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灯下漫笔》（一九二五年）

注：“人肉的筵宴”，这是鲁迅深刻披露中国旧文化反动实质的名言。历史在前进。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已远非鲁迅那个时代所能比拟了。但是，正如鲁迅所指出的，“这人肉的筵宴”“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那个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不正是在扬幡为孔子招魂，以图“反攻复国”，在那里演出穿西装革履和穿长袍马褂的都向孔老二顶礼膜拜的丑剧吗？在我们上海，不也是有一小撮“遗老”叫嚣要“保卫孔子”即要恢复他们已被革命人民掀翻在地的“人肉的筵宴”吗？现实的阶级斗争告诉我们：“排”人肉筵席和“掀”人肉筵席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一定要把掀掉“人肉筵席”，即批判剥削阶级旧思想的斗争进行到底！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

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死》(一九三六年)

注：这是鲁迅在逝世前夜留给我们很重要的遗嘱，是我们要永远不能忘记的遗嘱。鲁迅的话，是针对当时那些投敌的叛徒们而说的，但对孔孟之道以及一切利用孔孟之道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也完全适用。孔孟之道及其卫道小丑们损着被压迫人民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为的就是维护和复辟他们的反革命政权。我们革命人民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他们“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就是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痛打孔孟之道这条落水狗，痛打一切剥削阶级旧思想以及它的总代表大叛徒刘少奇这条落水狗，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坚持不懈地战斗！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解放日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彻底批判孔孟之道

作者 =

页数 = 171

SS号 = 11503054

出版日期 = 1970年07月第1版

前言

目录

- 孔家店的幽灵与现实的阶级斗争 & 史反修
“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和刘少奇鼓吹“
孔孟之道”的反革命目的 & 师宣革
刘少奇为什么要为孔子招魂？ & 史锋
- 史红青
叛徒、汉奸、特务王明为什么要替孔子翻案
？ & 横沙岛“八·二六”大学写作组
孔子的阴魂不散说明了什么？ & 史坚斌
从“敲门砖”到“垫脚石” & 沙延望
“朝圣”就是为了篡权复辟 & 济南部队装甲
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胡秀昌
从“同孔子妥协”看刘少奇的叛徒嘴脸 &
济南部队装甲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曹满栋 钱正康
砸烂孔子和刘少奇的“修养”经 & 驻沪空
军卫红鹰
孔孟的“四书”和刘少奇的黑《修养》 &
史反修
尊孔·修养·复辟——从黑《修养》的三
次出笼看刘少奇篡党篡政的反革命阴谋 & 华史斌
孔子的“仁”和刘少奇的“老人心肠”是
一路货 & 上海国棉三十厂 冯慧芬
拆穿“仁”的假面具 & 川沙县龚路公社华
炳新
葛文新
在“仁爱”背后的血淋淋杀机
伪善者的哲学
是“爱人”还是“吃人”——孔子的“

仁”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 红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实质 & 复旦
大学红卫兵 伍坚 肖矢

批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谬论 &
驻上海师范学院工宣队十二连

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谬论 &
巩旭黎

“中庸之道”是反革命之道 & 上袜四厂陶
友之

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 人民电机厂工
人写作组

驳“善为战，大罪也” & 上海警备区某部
张贤伯

决不听信一切帝国主义的“好话”——戳
穿孔子“君子戒斗”的谰言 & 驻沪空军卫红鹰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最勇敢——批
臭孟子“死伤勇”的谬论 & 驻沪空军冲中霄汉

孔孟的“忠、孝、节、义”是啥货色？ &
松江县泗联公社九星大队贫农 王宝宝

大批刘少奇宣扬的“孔孟之道” 大破
剥削阶级的“四旧”——松江县部分干部、贫下中
农批判孔子座谈会纪要

揭穿“礼尚往来”的反动实质 & 青浦县
青红哨

彻底埋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鬼话 &
上海县 辛农文

坚持晚婚 继续革命——斥孔孟的反动婚
姻观 & 松江县 红松

妇女力量半片天——批孔子轻视妇女的反

动思想 & 上海县 余红

驳“父母在，不远游” & 华锋汉

从“学而优则仕”到“读书做官论” & 南

市区工宣队 南胜虎

彻底粉碎刘少奇宣扬孔子反动教育思想的

罪恶阴谋 & 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砸烂孔子教育观上的三块黑牌 & 洪教施

从“四氏学”看孔子“有教无类”的反动本

质 & 永卫东

学习鲁迅批判孔家店的彻底革命精神 & 上

海师范学院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写